

本讀充補文國學中

集 一 第

選 文 記 傳 人 近

輯 選 瑞 越 張

者 編 主

翰 寄 張 音 毅 丁 五 雲 王

行 發 館 書 印 務 商

本 讀 充 補 文 國 學 中

集 一 第

選 文 記 傳 人 近

輯 選 瑞 越 張

者 編 主

岫 寄 張 音 穀 丁 五 雲 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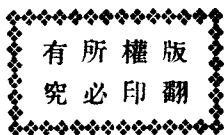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二月初版

(93821.1)

中學國文補充
讀本第一集
近人傳記文選一冊

每冊實價國幣貳角伍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選輯者

張越 瑞

主編者

丁王張 雲 音 五 岫

發行人

王長沙 雲南正街 五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各埠 商務印書館

(本書校對者王煊蕃)

導言

傳記爲中國史學上最有勢力的一種體裁，而在中國文學史上却是最不發達的一個部門。關於牠的歷史，本集的中國古文家傳記文選導言中好像有詳細的記述，這裏毋庸再贅了。近十年來，中國傳記文學運動受了西洋文學的影響，傳記作品完全改換了新的面目，爲使讀者明瞭牠與西洋傳記的關係起見，我覺得西洋傳記文學演變的大勢，頗有敘述之必要。

且先講西洋文學中「傳記」的字義。希臘文的 *Βιογραφία* 一字，是由 *Βίος* 加 *γραφία* 而成的。前者爲「生活」的意義，後者爲「記錄」的意義，合攏來解釋即爲「生活的記錄」的意義。凡是記錄一個人的生活的，就叫做傳記。

西洋傳記文學起源很早。猶太古代的史書裏就有不少的例子。實際，一切民族最古的神話寫的就是英雄與神人的生活，我們一樣可以稱牠做傳記。

但是，最古的，純粹的傳記作品却要到希臘文學中去尋找。古希臘留傳下來的第一部傳記要算謝諾芬（Xenophon 紀元前四二五——三五四）的蘇格拉底回憶錄（Memoirs of Socrates），那位大哲的言行在這裏可說表現得淋漓盡致。但真正空前啓後的希臘傳記家却是普魯塔克（Plutarch 四六——一一〇），他的希臘四十六名人比較傳（Parallel Lives of 46 Greeks and Romans）不但使我們知道了許多遠古的逸史，而且給後來的傳記家以無限的影響，所以一直流傳至今日，人們還認牠是第一流的作品。

降及中世紀，傳記作品雖然很多，十之八九却是寺院裏面的產物。修士們閒着無事，最喜歡給人寫傳，於是聖徒主教，與殉教烈士的傳記不斷的產生出來，不過，這種傳記，迷信和虛誕的成分居多，很少有文學上的價值。

然而傳記的形式，一直到十八世紀末葉才達於完善的境地。英國波司衛爾（James Boswell 一七四〇——九五）的偉著約翰遜傳（Life of Samuel Johnson）可說爲世界傳記文學開了一個新的紀元。牠集合約翰遜許多瑣言細行，而以戲劇的筆法把他的全部人格，生活襯托出來。但

牠不僅是一個文人生活的紀載，還是十八世紀社會生活的寫真。

十九世紀傳記文學之發展，大有一日千里之勢，作品之多，數不勝數。這時，英國又產生了一位傑出的作家路克哈特（John Gibson Lockhart 一七九四——一八五四），他同波司衛爾一樣偉大，一樣以歸納方法，從被寫者的文字和談話裏去尋找直接的材料，而讓被寫者自己把生活經驗告訴我們。就用這種方法，他寫成了十九世紀英國一部最偉大的傳記，司各得傳（Life of Scott）。

二十世紀的二三十年是新傳記文學的誕生時代，而造成這時代的唯一動力却要歸功於四個偉大的作家：這就是美國的伯列德福（Gamaliel Bradford 一八六三——一九三二），英國的斯特勒奇（Lytton Strachey 一八八〇——一九三二），德國的盧德衛希（Emil Ludwig 一八八一——），和法國的莫羅亞（André Maurois 一八八五——）。

伯列德福首倡「心理描寫」之說，他的美國偉人寫真（American Portraits）專從細微處來解釋偉大人物的心理。他認為傳記的功用只在發掘一個人真實的靈魂，人的靈魂固然會從大事中呈露出來，但不如小節細行表現得更加充分，所以要把一個人的氣質、意向、和心理的歷程解

釋明白，便須從小處着筆。

斯特勒奇的作品很能代表現代批評的傳記，他的維多利亞時代的大人物 (Eminent Victorians) 和維多利亞皇后傳 (Queen Victoria) 集合許多有關係的事實，加以批評的分析，對被寫者的人格作一貫的解釋。更重要的是，牠們排除了一般偉人傳記中神性化的寫法，注意力只是集中於偉大人物和一般人相同的地方，而把他當作一個極平凡的人去描寫，使我們覺得偉人和我們有同樣的人性，並沒有超越塵寰的神性，因而對他格外同情，格外親切。

盧德衛專寫歷史上的偉大人物，他寫哥德 (Goethe)，寫拿破侖 (Napoleon)，寫俾士麥 (Bismark)，寫耶穌 (Jesus)，寫林肯 (Lincoln)。在傳記的分析方面，他注重描寫人格和命運，對偉人的人格絕不誇張，把絕代的文豪哥德只看作一個常人，大政治家俾士麥只看作一個平凡的戰士，耶穌不看作一個神，只看作一個人。在這一點，他與英國斯特勒奇的態度可說是一致的。

莫羅亞在新傳記文學上最大的功勳，就在開了以小說體裁寫傳記的風氣。他的雪萊傳 (The Life of Shelley) 與笛斯列里傳 (The Life of Disraeli) 一方面將人物的事蹟如實地表現出來，

一方面將人物的個性渲染得同小說裏的英雄一樣活躍，一樣可愛，這種兼有小說情趣與傳記性質的作品，可說是新傳記文學的一大特色。

現在讓我談談選材的話：

這是中外名人的傳記文的合選本：中國傳記四篇，翻譯的西洋傳記三篇。中國傳記選自新文學運動中的作品，西洋傳記，則選自二十世紀的名著。二十世紀是西洋新傳記文學勃興的時代，作家如赫理斯、莫羅亞諸氏，都是第一流的傳記家，現在把他們的作品，節選在這裏，是要使讀者窺見西洋新傳記文學的特質；中國傳記固然在作法上多少繼承了前代的遺產，但自新文學運動以來，感受西洋影響特深，改換了新的面目，本書將牠列於西洋傳之後，是要使讀者看見西洋影響下，中國傳記的一點成績。

爲適應中學生的需要起見，我特別選擇了多方面的生活記錄。這裏有文學家，科學家的傳記；有革命先烈，教育老輩的傳記。青年從他的環境中所能見到的生活榜樣多半很簡單，很平凡，所謂

含有啓發性的生活榜樣究竟不易得到。他那少小而又純潔的心靈，須得多多接觸偉大的人品，和高尙的生活，長時期的薰陶自然會使他發奮向上，創造他自己的世界。本書所選，包括六個名人的生活紀載，這六個人，在生命的過程中各走各的途徑，各有各的成就，他們做事的精神或治學的方法，都有獨到之處，值得青年拿來參考，作爲身心修養的南針。

本書翻譯的西洋傳記三篇，係選自商務印書館出版的中文譯本，所選的大都是饒有趣味的部份，不過，遇有譯文過於晦澀，或意義過於深刻的地方，爲適應中學生的程度起見，我都刪了。中國傳記四篇全是明白暢曉的短文，沒有刪節的必要，所以仍照原稿選在下面。

編者三二七，一九三七。

目次

| | | |
|---------------|--------------|-----|
| 蕭伯納傳二則 | 赫理斯作 黃嘉德譯 | 一 |
| 屠格涅夫青年時代的文學嘗試 | 莫羅亞作 吳且岡譯 | 三〇 |
| 法拉第傳二章 | 克勞塞作 周昌壽譯 | 五六 |
| 朱執信先生傳略 | 汪精衛作 | 八二 |
| 丁在君這個人 | 胡適作 | 九二 |
| 高夢旦先生小傳 | 胡適作 | 一〇六 |
| 我所認識的高夢旦先生 | 王雲五作 | 一一一 |

近人傳記文選

蕭伯納傳二則

赫理斯作
黃嘉德譯

一 工作去

羞人答答的蕭伯納十五歲就出去尋找工作了。他有甚麼資格呢？他能唱許多漢得爾（Handel）、海因（Haydn）、摩札特（Mozart）、貝多芬（Beethoven）、孟特爾遜（Mendelssohn）、羅西尼（Rossini）、多尼側提（Donizetti）、柏利尼（Bellini）、味第（Verdi）、谷諾（Gounod）、邁耳貝耳（Meyerbeer）的作品，也能用口哨吹出他不能唱的歌曲。這在商場似乎不成爲資格，但假使辦公處的「四人合唱隊」需要一個唱上低音的人呢，這麼一個精通的少年顯然很可以幫幫忙的。

人家介紹他到布商司各脫·司班·倫尼公司(Scott, Spain. & Rooney)去。司各脫頗想僱用他。但倫尼有個父親般的良心，他覺得這少年生來不是做這種平凡工作的人。蕭逃開了，對這次的緩刑心中頗為感激。

那時我剛離開一間英國公共學校，因為我沒有得到劍橋一等獎學金，正氣憤憤的拿着二等獎學金跑到美國去。差不多在這時候，蕭得有勢力的伯父的提拔，終於找到第一個工作。我十四歲時開始(不用勢力)做一頭「沙豬」(‘Sand hog’)——一個造布魯克林橋橋基的水底工人。小我一歲的蕭得他的佛勒特力伯父的提拔，在杜柏林地產公司找到職業了。我一天得四塊錢；他每月得四塊半錢。今天他是百萬富翁，而我卻始終頻於破產。

蕭在一八七一年入杜柏林地產公司(Uniacke Townshend)工作五年。他開始當小職員。那邊僱用許多紳士派的練習生。他們當老板不在公司時，用很高的報酬請蕭教授歌劇。他們最喜歡的是伊脫羅瓦都(II Trovatore)劇裏彌色利爾(Miserere)的監獄那一幕。蕭勉強接受他們的請求，不談宗教，因為在他們看來他的宗教觀的確太反動了。他當小職員的一件工作是每

星期二坐電車到特勒努爾向惠頓區多特街十幾間茅屋徵收一先令至二先令半的週租。這些茅屋現已改建較漂亮的房子了。他寫鰥夫之室（Widower's Houses）時還沒有忘記這段經驗。

會計員是公司中責任最重的職員，他在相當限度內也是個私立銀行。一年後這位會計員突然因事去職。在這緊急的時候，公司把青年的蕭伯納陞補會計員的位置。他辦事成績頗好，薪俸因而也加到一年四十八鎊，而且購置一件燕尾服了。一切都順利；他的父親現在已經完全戒酒，他覺得蕭已經漸漸實現他的志願了。但蕭自己厭惡這種奴役，只在等候機會逃走，不但離開這公司而且離開他所謂「可嘲笑的城市」杜伯林到倫敦去，當時惟有在倫敦這種地方，纔可以從事藝術生涯。

後來成爲愛爾蘭小說家的麥努地（Edward Mc Nulty）是蕭的同學。當蕭在坦馨地產公司管理銀錢出納事務時，麥努地正在愛爾蘭銀行紐里分行工作。他們幾乎天天舉行「通信決鬪」，這種現象即使在寫作技癢的青年男子間也是罕有的，雖然在女孩子間較爲普通。他們說妥後來要把書信全部焚毀，所以他們總毫無顧忌的發表坦白的意見。沒有人知道這些書信是否值得這

麼慎重處置；無論如何，現在似乎一封也不存在。

蕭對通信感到極大的興趣，於是便向一個編輯嘗試一下。他參加過一次穆德與山基 (Moody and Sankey) 的奮興會。他寫一封信給公論雜誌 (Public Opinion)。信登出來了，證明喬治蕭卡爾的兒子是個無神主義者。這對世界雖然沒有多大影響，但可把杜伯林蕭家嚇壞了，這放蕩青年的伯叔們舉行會議，但是並沒有甚麼舉動。他破題兒第一遭看見自己的著作刊行了。

蕭的母親曾冷冷的拒絕宗教，他的伯父曾下流的嘲笑宗教，他的父親在努力宗教工作的嚴肅中總不能抵抗滑稽性格的誘惑，這樣看來，蕭的信仰無神主義真和洛基斐勒 (Rockefeller) 的兒子從事煤油生意一樣的新奇。雖然如此，那位編輯先生並不知道這些事。他由一個讀者對宗教的否認得到相當的印象，就把那封信刊登了。一八七一年九月，蕭寄第二封信給遊藝雜誌 (Vaudiville Magazine)。這封信把議論和理由寫得很長，分量過重，弄得雜誌社被郵局罰兩辨士。但這次他的信也發表了。

從那時以後他寫了多少呢？他這老會計師會計算行數嗎？百萬字或無量數萬萬字——雜誌、

報紙、書籍、政治短論、小冊子，甚至於貿易論文。還有，寫多少封信給編輯呢？

寄信給公論雜誌已是六十年前的事了。現在以一週千鎊的稿費給報紙寫文章。有人寫得比他還多嗎？我所說的是指字數不是冊數。我也曾寫過千千萬萬字，雖然近來這無聊的苦工竟是那麼討厭，使我欣然躲開，到街邊咖啡店去晒太阳。但是，蕭依舊用他那驚人的速度繼續工作。他把這點解釋得很好：他說他患神經病似的工作着，正和他父親喝酒一樣。

他很可以向大學投射嫉妬的目光，因為，即使在那時候，他要進大學也不是太遲的。但他說他沒有競爭的本能。他從來不希求獎品、學位、爵位。他說他沒有和人家競爭大學獎品（受大學教育），因為他對自己的重要性感覺太深，不能使他覺得他能受金牌或獎品的誘導。

關於他的教育，最大的困難是在他的教養（據他說）含了很多音樂的成分。熟識文學傑作而不熟識音樂傑作的人，不能像蕭後來那樣寫關於華格那（Wagner）的文章。

雪萊（Shelley）給他深刻的印象。他把他的散文和詩從開端讀到結尾；他在青春時代視雪萊為神聖的人物。但貝多芬與初期的華格那也影響他。如果他不是十全十美的華格那信徒，他至

少是初期的華格那信徒。

與社會主義的接觸使他覺得有研究經濟學的必要。他費四年工夫研究經濟學，到完全得到它的精髓時，纔發見（據他說）沒有一個社會主義者會這麼麻煩過。當時他除法文外，不能不用字典讀外國語，現在也是如此。他早年熟識意大利歌劇，後來纔能勉強讀意文報紙；他以為如果你把一張德文文件交給他，你免不了有使他知道內容的危險。他學西班牙文有特殊的目的，但他並沒有繼續學下去。其實他對外國文字的把握，並沒有到可以自由談話的程度。一個女人問羅丹說，蕭是否能說流利的法語。羅丹的答語常常給人家援引：「蕭先生說得不大好，但他表現得那麼有力量，使你終於能了解他。」

他有一次寫信給我說：「至於拉丁文，名義上雖是我整個學校教育的目標，但我不能讀一篇慕誌銘或何拉西（Horace）說白尾語而不發生錯誤。自然我利用譯文與音樂的背景。我熟識浮士德（Faust）與尼培郎的戒指（The Nibelung's Ring）兩齣歌劇，和德國人熟識莎士比亞一樣。我這個人是孺子不可教，不能度過初等學校第四年級考試的難關——別人不是都會的；雖然

如此，你懂得我的意思吧。」

在他少時，愛爾蘭沒有加力克（Gaelic——操 Celt 語的蘇格蘭高地人——譯者註）同盟，沒有愛爾蘭國家劇院，也沒有人相信愛爾蘭有文化可言。真的，有志的愛爾蘭人都覺得第一件事是趕快離開愛爾蘭；蕭的感想也和他們一樣。人家會抓住這點罵他沒有愛國心。他答道，他在職業上不是愛爾蘭人而是文豪。「我是屬於歐羅巴的藝術，它包括英吉利文學，日耳曼音樂，意大利與荷蘭的繪畫。愛爾蘭在一八七六年還不算在內。如果她現在已經加入藝術的集團，那對她是很好。」

在一八七六年三月他通知坦馨地產公司，將於下月辭職。關於辭職的事，蕭並沒有徵求他父親的意見。他當然以為他的兒子這種舉動無異拋棄僅有的機會。他的妻和女兒們已經到倫敦去了。他兒子的離開使他完全孤獨。但是家人脫離他沒落的掌握，倒可使他為所欲為，自由行動。所以他並不憂愁。他唯一的舉動是請求坦馨公司為這逃亡者寫一張誠懇的證明書。這激起蕭極大的輕蔑，和他父親衝突起來。在他看來，他的商業纜幹不過是一條把他縛在辦公案頭的鐵鏈吧了。把

未來的沙士比亞挑戰者保證爲適當誠實的會計員，這是恭維的話嗎？

然而，他說他頗能了解約翰生博士在利其費爾 (Lichfield) 光着頭站在雨中，去贖他對他父親的不敬舉動。他自己也有那種感覺。

在一八七六年四月，臉上光滑如嬰孩（那赤鬚鬚是二十四歲後纔養起來的）的蕭伯納背着他的絨氈行囊到杜伯林城北，搭船赴英格蘭。他三十年不會回愛爾蘭，三十年後還是因爲要取悅他的妻纔回去一次的。

一一 在倫敦的落魄時代

現在蕭伯納二十歲了。他的幼年時代早已成爲過去。他代替一個四十歲的人，佔據一個負責的位置，已經度過四年的生利生活，而且在家庭裏不受任何保護。在敘述他的倫敦生活之前，讓我們看一看他帶甚麼教養離開杜伯林到倫敦去。

做小孩子時，他讀一切手頭拿得到的書，由東方夜譚、天路歷程 (The Pilgrim's Progress)

魯濱遜漂流記，讀到附於塞老士（Selous）圖解的莎士比亞作品雜集，神仙皇后（Faerie Queene），約翰吉爾賓（John Gilpin）和黎德（Mayne Reid），古柏（Fenimore Cooper），司各德，狄更斯，拜倫，窩德（Artemus Ward），馬克吐溫等的作品，俗語（Household Words），年到頭（All the Year Round）與多量拉雜的傳奇小說。

在他十歲之前，他的家由平凡的新格街搬到達爾基山上的屋子。由這屋子的前門可以望見從達爾基烏到威克羅山的吉林尼灣全景，由後邊的花園可以望見從金士頓到好特坡的杜伯林灣全景。這個地方把他迷住了；當他後來發見雪萊而變成他的熱烈的信徒時，它更給他看見雪萊詩歌裏的大自然奇觀。

到成年的時候，他的分析力——這是他做批評家的成功祕訣——開始在發展。他對科學，尤其是物理，發生很大的興趣，他讀德國物理學家赫爾姆霍斯（Helmholz）的演講裏，關於聲、光、熱，以及水的形態的發見（根據丁鐸爾 Tyndall 所作的簡論。）他讀達爾文的著作，由德雷柏（Draper）的著作與『不可知主義』（Agnosticism）的機關報威斯明斯特雜誌裏，研究宗教與

科學的衝突。但他卻沒讀過馬克斯維爾 (Clerk-Maxwell) 與現代數學物理學家的著作。

他很虔誠的讀伊里奧脫 (George Eliot) 的小說。他讀約翰司徒衛彌爾 (John Stuart Mill) 的自傳，自己會體驗過憂鬱銷沉的心情，和彌爾著名的描寫一樣的心情。彌爾的自由與代議政體也給他深刻的印象。他讀一些科柏特 (Cobett) 的作品，以科柏特古雅的法文文法做自修法文的課本。

和一般英國新聞記者與作家比較起來，蕭即使把音樂智識除外，還是懂得太多，不是懂得太少。這是很明顯的。他自己說過，他的困難多半不是發自他不知道的東西，而是發自他不相信的東西。

蕭並沒有從事文藝的志向，爲甚麼跑到島國裏唯一的文藝市場倫敦去呢？這是有待於說明。問題的答案可以由他的無韻詩劇可敬的巴士維爾 (The Admirable Bashville) 裏主人公被訓的一段得來：

「鹵莽的少年，你要知道，在這星辰縱橫的世界，命運驅策我們去尋找我們最重要的幸福，

在我們能做的事，不在我們願做的事。」

蕭進杜伯林皇家學會藝術學校後，纔相信他自己不是畫圖的人才。他的油畫與水彩畫的私人實驗已經給他科學化的思想毀壞了。至於音樂，他沒有可做買賣的專門技能，也沒有寫作的衝動。

總之，他已然不能繪畫，不能彈奏，不能寫；他已然決定不做別樣他能做的事情——例如會計工作之類——那麼他只好從事著作生涯了。他到倫敦和他的母親與姊姊同居之後（他的二姊剛死於威德島，）再度被迫去就一個商業的職位。他被聘在短命的愛迪生電話公司的外務股工作。他的職務是去找倫敦各種商店的老板，說動他們讓公司把電話線安置在他們的房屋上。得了短期的討厭經驗之後，他榮任外務股長了。當公司給培爾電話公司買去時，他乘機和它脫離關係，橫着心腸去寫小說。李（唱歌教師）想法子幫助他，掛名在大黃蜂報（The Hornet）當音樂批評記者，讓蕭寫評論拿稿費。但是不久音樂會的代理人不願再送贈券了，因為蕭看見當時倫敦音樂界連一個有吸引力的指揮者也沒有，大發輕蔑排斥的言論；結果報紙停刊了。他在亞爾培廳聽

過華格那自作的音樂之後，不罵他做音調欠佳的音樂騙子，反而崇他爲作曲大家。這使蕭達到「無可救藥」的最高峯。

報紙不久停刊。大黃蜂失掉了刺，因此刺也失掉大黃蜂了。由一八七九年至一八八三年，蕭寫了五部小說，但倫敦所有的書店和幾家美國書店都不願出版。在這寫小說的五年中，他只賺到五鎊十五先令六辨士的稿費，其中十五先令是一篇關於「洗禮名字」文章的報酬，其餘是一篇關於「賣藥」文章的報酬。後面這篇是一個當律師的朋友託他寫的，用途如何，蕭可不知道。

在這時期裏，蕭無論如何須得生活下去，不管他落魄到甚麼地步，不管他的舊衣服舊皮鞋破敝到甚麼地步。他的父親每週供給一鎊，直到一八八五年他死的時候。他的母親做私人學生的職業音樂教師，成績不佳，她永不願放棄愛爾蘭鄉紳階級貴婦的地位。英吉利中等社會的家長要他們的女兒學唱迦伯列 (Virginia Gabriel) 與沙利文 (Arthur Sullivan) 的歌謠。她對這個意見一點也不願遷就。後來她在北倫敦書院及其他規模宏大的女子公共學校裏訓練唱詩班時，纔努力適應環境，因而得到相當的成功。但在這時期之前，家庭狀況已經陷入長期的困窮。如果沒有

白教堂的遺產可以變賣，和一些愛爾蘭的典當利息，蕭也許不能不拋下筆桿，做個大丈夫，把他的母親由飢餓中救出來。可是事實上她倒反能救他。他堅持說，當時是他母親衣食他；其實依一般傳記的慣例，該是他奉養她的。如果他依傳統的習慣說起謊來，他也許不至於那麼開罪於人。他對這點現在還覺得好笑。

蕭把寫小說當做毫無樂趣的日常工作，因為他知道他必須做一點事情，否則潰滅。從那時到現在他始終恨這些小說。第一部小說擱了五十年纔出版。給第一部小說引起一點興趣的書店老板，對第二部小說表示失望而拒絕了，因為在這部書裏，蕭暴露他的反小資產階級的礮臺，用一個有教化的無產階級者的嘴巴，毒狠的批評傳統的宗教與傳統的上流社會。在第五部小說裏，這種態度已經形成馬克思主義了。

雖然愛默生幾年前曾說：「英吉利人的命運總算是世界上最好的，」但蕭在一八七六年由杜伯林到倫敦的一跳證明此言之不確。當時不是藝術家頂順利的時代，因為一八七九年的倫敦受了一個到一九三一年纔重見的不景氣的大打擊。

失業像割麥那樣的把人們的職業刈割了去。過去的春天受災很重——是農夫一世紀來最壞的節季。商業頻於破產；那些把店窗堆滿陳列貨品的小商人，現在只好望着空洞的玻璃窗出神了。

各種娛樂場都縮小規模或關門大吉；人們唯一的去處是酒館，即使在這種地方多數的人也是買不起啤酒的。

情形壞到使富者怕窮人造反。比較識時務的人廢止一切宴會、跳舞會、交際會，與他種風雅的外觀。威爾士太子（後來的愛德華七世）幫助急賑的工作。

食物、煤、柴、蠟燭的市價高漲不已。工廠倒閉了，倫敦西北鐵道公司辭歇五千工人。六千利物浦的船塢工人大罷工。接着格拉斯哥西方銀行破產，幾乎使整個島國淪亡了。

大霧在一八七九年十一月來臨，直到一八八〇年二月始散。蕭的第一部小說剛在大霧前脫稿。這部小說證明他還沒有意識到一切政治上的騷動。在那年的秋間他受朋友的慫恿，加入一個叫做「考求者」(Zetetic)的辯論會。當時辯論會是很時髦的一種組織，其中最著名的——

因爲最「非正統」——是倫敦辯證學會 (London Dialectical Society)，專門討論約翰司徒衛彌爾的論文自由的原理。這個團體是屬於彌爾派，所以主張男女平等。在一八七九年，它已是一個成立多年的機關，考求者學會是後進的辯證學會。

當蕭給他的朋友勒基 (James Lecky) 帶去赴考求者會議時，他覺得難安緘默。他在一種可憐的膽怯不安的狀態裏，移動戰慄着的雙腿站起來，第一次當衆演說。他坐下來時，覺得自己是做了個十足的傻子，這恥辱必須伸雪的。他發誓要每週當衆演說，直到他完全把握住演說的藝術，否則，因想到在大庭廣衆之間演說，心臟受重大的打擊而死。

他遵守這個誓言。他加入辯證學會。他加入勃洛克 (Stopford Brooke) 的辯論會，叫做培特福 (Bedford) 的。他參加南區小教堂 (Southplace Church) 的會議。當時這個地方是「不可知主義」的大本營，由小會議場擴成公共大廳。不管甚麼地方舉行公共討論，場中總發見他這個討厭的人物。那時在倫敦，這種討論會多得很，星期日的報紙常常有整欄的通告。

勃基介紹他和一個亞塞士 (Alaace) 的歌劇唱者認識。他是個「深低音」唱者，名叫迪克

(Richard Deek) 是有名的法國陶器製造家迪克的兄弟，但彼此感情不洽。迪克是蒲魯東(Proudhon)——甚麼是財產、偷竊的作者的信徒。這時他住在肯德許鎮過窮生活，懷着革新世界和自己的聲音（恰巧也是用一種「方法」）的夢想。關於「方法」蕭甚麼都知道；他晚上有時陪着這個老人家坐，聽他用法語傾吐他的胸懷；迪克雖在倫敦住了九年之久，但還懂不到幾句英語。

蕭由迪克學到三樣東西：（一）把他的頭髮向後直梳，像他的一切諷刺畫家所熟識的模樣，不再像維多利亞中期的女人那樣的把頭髮貼在前額了。（二）怎樣發法語的母音，去代替英語的二重母音。（三）在演說的時候，怎樣發出子音與加重子音。迪克曾做過爾撒特 (Delsarte) 的學生；從那時後，蕭在最大的廳堂裏，也沒有使聽衆聽不見或不了解的困難了。

爲着練習演說起見，他常常參加公共集會。一天晚上他到法林頓廳 (Farrington Hall) 去；在那裏擠了一堂的觀衆正給一個有力的演說家迷住。這位雄辯家便是亨利喬治 (Henry George)，他的進步與貧窮當時剛是銷路最佳的著作。

這是蕭在思想上的大轉機。他似乎突然醒悟了，由維多利亞時代的「不可知主義」劇烈轉

變到經濟的共產主義。他讀進步與貧窮，開始在社會民主同盟的會場上主張國營田地制度。社會民主黨員譏笑他，叫他去讀馬克思的著作。他真的拿德維爾 (Deville) 的譯本去讀，同時發見他們沒有讀過馬克思的著作。這大蠢感家對小資產階級文化的暴露，造成蕭反抗這種文化的科學基礎。現在他對辯論已有充分的練習，隨時可以當主要演員，即席作一個鐘頭的演說。當時伍爾維奇進俱樂部 (Woolwich Radical Club) 是在一個名叫班納 (Robert Banner) 的蘇格蘭社會主義者的勢力下。這俱樂部請蕭演說；他感到相當的憂懼而接受了。演說的題目是「盜賊。」盜賊是地主與資本家，無產階級者在他們之間被釘於十字架上。這次演說是成功了。

在此後十二年中，蕭在講臺、說教壇、市場方場、街角、公園的斜坡、碼頭門口，幾個窮同志租來的地窖，或擠滿三四千個各種各樣聽衆的大廳，不斷的講社會主義。這種經驗不久把他最後一些空虛的靦覷與膽怯也掃除了，使他安閒自在的與各階級的人物接觸，由主教與內閣閣員到賣蘋果的小販與碼頭工人。他把每週的演說視爲當然的事情，有時候早晚都講。他計算平均每半月至少演說三次（不過，他和列寧一樣，養成一種向聽衆談話而不是向他們演說的藝術）。十二年中差

不多作過一千次演說，每次演說後還要答復聽衆的問題。

他沒有加入社會民主同盟。他因為沒有別的團體可以加入，正想加入這團體時，恰巧得到一本顯是同情於社會主義的小冊子，題爲多數人爲甚麼貧窮？這是費邊社（Fabian Society）的第一種出版物。這個社團的名字使他得到一種靈感。它含有博學，文化，個人大公無私的意義。他參加一次大會，在奧斯那堡街一間房子裏發見一些和他同階級的人。他們是上級社會的文官，專門職業者，商人，有不勞而食的進款的郊外理想主義者，與一個年長，而很沉默的無產階級者。社中的書記是一個股票經紀人。他們輪流在各人的寓所或客廳集會。社中沒有一定的會費，全部進款每年不到四十鎊。

蕭找到可以活動的集團環境了。他在第二次赴會時，帶了一個考求者的會員同來：這個人是錫尼衛白（Sidney Webb）——後來的派司斐爾爵士，那時當殖民部的居留事務員。衛白第二次赴會時，帶他的同事錫尼奧立維亞（Sidney Olivier）——後來的奧立維亞爵士。錫尼奧立維亞不久便被選爲社中的書記。瓦拉斯（Graham Wallas）後來纔加入。勃蘭特（Hubert Bland）

已經入會。他是個可畏的業餘拳術家，那時當一間水力公司的書記，但後來成爲著名的小品欄新聞記者與閒話的作者。在倫敦社會運動中，這樣的一羣人是不能成功甚麼組織的。他們是由和衷共濟，分工合作，才能造成費邊社，使會務不至停頓，後來在下議院產生一個勞工黨，在德國產生穩健的社會主義。蕭在社中當了二十七年的執行委員。這個團體現在還存在。

蕭不是費邊社的發起人。從這裏我們看見他始終是投機者；他注意到一個門路，立刻衝了過去；使人家相信那是他開關的。在這裏他的銳利眼光把握住一些主要的觀點。他對自己的小資產階級劇烈的馬克思派的反動，與他對勞工的擁護，並不能使他發生錯誤的信仰；他不相信，在辦組織工作時，他可以和不識字的手工人並駕齊驅。他們對歷史沒有智識；他們看不見介於急進派口號裏的『店窗道德』(Shop window morality)——指中等階級的偏狹道德觀——譯者註)和民主政治，與政府的真機械作用之間的深淵；他們對一切不能崇爲領袖的市僧小資產階級者具有根深蒂固而很正當的不信任。這使普通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者的分離，成爲做事時的初步必要工作。

這種觀念在凱亞哈地 (Keir Hardie) 一類思想簡單忠直的鑛工領袖看來好像是勢利的見解。他以博愛與團結的名義要求分立的團體合併爲一。蕭沒有說不可以。他說：『讓我們試一試。』接着他想法子做一個合併委員，同時施離間的手段。凱亞哈地揣度蕭決心不使合併的計劃實現。他把蕭開除了；但會裏的情形弄得比從前更壞。他把所有的費邊社員開除了。這正是蕭所希望的。會中其他的人衝突得很利害。在一切不洽分子都被開除之後，只有凱亞哈地自己一個團體存在着。現在又和發起的時候一樣了。

費邊社員給無產階級社團叫做客廳社會主義者，安樂椅社會主義者，氣與水的社會主義者。但蕭雖然不願和他們同做委員會的工作，卻是他們的演講明星之一，用最友好的態度和他們往來，永不躲避馬路與公園的紛擾與混雜。同時他不願捨身殉道，不贊成無訓練的徒手百姓能對抗警察與兵士的謬見。他只有兩次自願被拘捕監禁；恰巧他兩次運氣都好：第一次警察向街角集會的新教徒自衛者投降，第二次他們另選一個志願者入獄。

環境迫他選擇一個團體，他有兩條路可走：第一是加入那顯赫的海因曼 (Henry Mayers

Hyndman) 領導下的無產階級小集團，自稱爲社會民主聯盟會的。第二是那更不熟識世故的「無政府共產主義者」的集團。社會運動偉人威廉毛理斯 (William Morris) 叫它做社會主義者同盟會，但不久又以爲不配，把這名稱取消。對小資產階級宗教的戰爭是由全國現世會主持的。這團體只能爲勃拉特拉夫 (Charles Bradlaugh) 這個超人召開會議，他是個講臺上與法庭裏的暴烈戰士。安妮培散德 (Annie Besant) 是他唯一的同志；但她經蕭推舉之後，離開他加入費邊社了。

這一切團體對蕭都沒有用處：他知道在憲法制度下組織社會主義團體不是匹夫匹婦所能辦得到的事情，也不是和警察的一戰所能成功的。他也知道他須用批評的眼光，及與他一樣聰明，而受過更佳訓練的智識階級接觸，去彌補他在教育上的缺憾。

而且，社會民主聯盟會與社會主義者同盟會提議招請全體無產階級者做會員，要他們每週納一辨士的會費。蕭和列寧一樣，知道和平的或鬪爭的革命都是少數專門者的工作。費邊社不會有過二千以上的社員，而且最佳的工作是在一百個以下的社員手裏完成的。

在這時候，蕭的愛爾蘭國家主義怎麼樣了呢？它完全給馬克思拋在一邊了。雖然議會在一八七〇——一八八〇的年代正激動着自治的怒潮，雖然報上用五光十色的巨大標題記載鸞鳳公園的慘殺案，與迪克比哥特（Dick Pigott——蕭幼時已經認識他）偽造巴奈爾書信的新聞，雖然比加、赫利與塞士頓的破壞策略，在巴奈爾的領導下，正在削減政府的勢力，鄉村夜間搶劫與免租運動正在激起杜伯林城堡的憤怒，但蕭把全副精神貫注於國際社會主義的較大論點，不能在區區國家主義上花費工夫。在全國自由主義俱樂部的一次集會裏，他站起來問主席說，除愛爾蘭問題之外，是否還有別的議案。那憤怒而吃驚的主席華特生（Spence Watson），給他反面的答復。蕭拿着帽子，很嚴肅的大踏步走出會場。他不能容忍那些英吉利格拉士吞信徒（English Gladstonians）對愛爾蘭的熱烈愛國心。他說不列顛無產階級者自己已有比愛爾蘭更大的苦難，不管甚麼自治不自治。他說愛爾蘭人必須自助。不過在奏英國國歌的時候，他不站起來，不脫帽，也不在公共宴會裏舉酒祝英皇的健康。這個習慣在他的行為上根深蒂固，後來當愛爾蘭自由邦的成立消滅他的不平時，要革除它感到相當的困難。

我與一八八〇年代初期的社會主義運動也有相當的接觸。但是它的集團不能吸引我去參加。我們倆僅僅會過一次面。後來我們在資本家新聞事業的世界裏各當編輯與投稿者時碰頭，纔熟識起來。老實說，他之所以能吸引我，是因為他是文學的藝術家與戲劇家，而不是因為他是政治家。我對他在費邊運動裏的操縱手段不生興趣；至於他的朋友錫尼衛白與俾亞特麗斯衛白（Beatrice Webb）所作關於官僚政治歷史與政治學的許多書，我更是動也不會動過。他重視他的政治工作。他曾說，由一八八四年費邊社成立到南非戰爭前，社會主義失敗的幾年是他一生最光榮快樂的時期。但是我們過去和現在都不用這種看法。我對他的冀望始終比他所實現的工作更大。到一九一四——一八年的大戰時，我對他的政治工作纔真正發生興趣，但是結果他依然使我失望。

蕭做費邊社員的事，除了演說影響他做著作家的風格外，其實不值得我們費很多的工夫。他的著作從來是充滿着演說式的文字的。

蕭說他在少時是非常莽撞的，但他做孩子時極爲怕羞，卻是事實。像他那種靦腆的樣子在過

去和現在都使我有點難於理解。當然，我覺得傲慢常常是造在不穩固與一種低級的感覺上，雖然在另一極端，很有自信的人也有厚顏的傾向。墨索里尼是個好例。但另外一種基於懷疑自己地位的傲慢是很明顯的。蕭在最卑劣的時候永不懷疑自己的地位，因為他還是蕭伯納；但他確曾懷疑自己的才能。他是怕羞的，因為他在現實的世界裏覺得不自然。

在杜伯林地產公司裏，蕭的靦覷不是怎樣可怕的弱點，因為他是小孩子在幹成人的事情，而且自知對工作頗能勝任愉快。你不要以為愛爾蘭重要的地產公司裏的會計員是和錯姻緣（Misalliance）裏的事務員一樣，是一個鐵絲籠中的奴隸，給顧客兌換銀錢。他每天除了兌現支票、收納寄存物、把鄉間所收的租錢存入銀行之外，須繳納五十區地產的戶口稅、免役租、抵押利息、寡婦所得產、年金、保險費和其他的東西。他做這些事情，不能同時感覺像個孩子吧。他有社會上的地位，不和窮人在平等的關係上往來。但在倫敦他不能不到外邊去，真的面着世界。例如以電話公司的職務而言，他須和人家接觸，把新奇的思想販給他們。這種思想是一種對他們的祕密的侵犯；在這裏他是完全錯的，他們是完全對的。

你要說服人家，使他們情願讓你在他們的產業上豎立電話桿，不能同時又靦覷而傲慢的。你須做一個介於海盜與商店巡視員之間的人物，纔能消滅他們的抵抗力。在英國這個「房屋爲城堡」的思想根深蒂固的地方，那種抵抗力是特別堅強的。在這種情形之下，你須用高壓力的談話勸誘他們到精疲力竭的程度，纔有勝利的希望。蕭的禮貌在東邊區可不大適當。如果你保持紳士的風度，東邊區的人會以爲你一定是在幹紳士的工作。

倘若蕭少時沒有看見一齣叫做鎮靜如胡瓜（Cool as a Cucumber）的戲劇，他就永不能成功。劇情講到一個被家長送出家庭，作環球旅行以治羞怯的青年。他回來時變得極爲厚顏無恥，沒有人不受他的凌辱，但後來他居然用他的傲慢獲得他們的歡心了。

在潛伏着素食主義的蕭伯納看來，這是他的性格自脆弱造成有威壓力的過程中，最需要的「生肉」和摩羅士（Maurois）一類的人物，企圖改造自己的生命去脗合巴爾扎克（Balzac）的故事一樣，蕭有意摹倣「胡瓜」的技術，使他在這未被靦覷克服的世界裏可以感到安然自在。

蕭克服靦覷之不易可由他自己的懺悔語去說明。在他到倫敦的初期，他總得於邀請他的人

家門口來回走了二十分鐘，才鼓起勇氣進去。這麼一種防寨式的勇氣，這種容易變成羞怯的厚顏，使寫小說成爲必然的結果。在小說裏，他儘可隨意說他所喜歡說的新鮮事物。

所以，他現在由成功的會計員，失敗的豎立電話桿的跑街，變成小說家了。

他在一八七九年寫成第一部小說——未成熟（*Immaturity*）。他說他每天用細筆跡寫滿五面摺成四頁的紙張（二十面），晴雨無阻。他用這種方法，於五年內寫成五部小說，同時用他母親的剪刀修整他的袖口。倫敦書店老板和幾個美國書店老板都不願出版這些書。據他自己的解釋，他的奧古斯丁（*Augustan*）派的風格是落後一百五十年，而他的思想是前進一百五十年的。但他親自與書店老板接洽，也許是一種失策。

除未成熟一書外，他寫了不合理的難題（*The Irrational Knot*）、藝術家的戀愛（*Loves Among the Artists*）、開塞爾拜倫的職業（*Cashel Byron's Profession*）與一個不善交際的社會主義者（*An Unsocial Socialist*）。

蕭說勃萊克烏（*Blackwood*）曾接受一部小說，後來又退還。關於第一部小說，蕭由摩黎（在

我之前的半月評論主筆處得到一篇讀者的長報告。至於其他幾部小說，他沒有得到一點激勵。在他成爲成功的戲劇家之後，這幾部小說當然都出版了。第一部小說是到五十年後纔印刷出版的。這部小說我沒有看過，不知道要怎樣比較。其他的小說祇能說是比『被忽略的白鐵』（*neglected pewter*）還要暗晦。

他自己說，這些小說是『很不成熟的東西，寫得很細心。』因爲蕭在那時期，有一種風格，一種學校教師的風格；這就是說，他寫下的東西都要使外國人用字典可以完全看得懂。他的材料都是採自週遭的人們和自己直接的經驗。這是寫小說的惡劣方法，除非你過着冒險的生活；然而我們已經說過，他的生活是比一個副牧師的生活還要遁世的。你可以發見這些小說充滿着自傳的材料，尤其是序文。例如，他的第二部小說不合理的難題把他在電話公司的經驗和盤托出。

然而，據他自己說，『不合理的難題可以視爲「生命力」的初期嘗試，由一個未成熟的二十四歲作家的幫助，用英文寫成娜拉（*A Doll's House*）一劇。』

他在二十四歲時就留起鬚鬚。當他發見它開始就是『惡魔式』（*Mephistophelean*）時，他

快活得難於形容，因為他幼時的一個野心實現了。從那時起，他就和人家激烈反抗。在這時他向他們學到許多東西，雖然現在他覺得他在倫敦的初年真是笨拙得可驚。

藝術家的戀愛用蕭的細筆跡寫來，長四百八十四頁，稿裏更改的地方都用圓圈，使人家無從看見原文。此書完成於一八八一年，改正於一八八二年，重改於一八八三年。在寫此書的過程中，他曾患天花，以致工作停頓了一些時候。天花增加鬚鬚生長的速度，同時使他終生成為反對種痘者。雖然，天花並沒有使他成為麻子。

後來有人攻擊他，說他隨意剽竊易卜生的作品。他的答語指出寫這些小說的時期；他堅持說這時期是在他聽見易卜生或莫泊桑的名字之前。

蕭說沒有一個書店老板會接受他的小說。在這些落魄年代（他在五十年後寫第一部小說的序文時，對這時期曾加以描寫）的五部小說中，四部會刊登社會主義者的雜誌，以填塞篇幅，後來給人家在美國剽竊了。不管他對這件事忽略到甚麼程度，憎惡到甚麼程度，這些書現在還擺在書攤上出賣的。這一切情形證明他是完全失敗的了，直到他轉到批評上去的時候。（見蕭伯納傳）

附記

蕭伯納 (George Bernard Shaw) 是現代英國一位最偉大的戲劇家。一八五六年生於愛爾蘭都伯不 (Dublin)。早年在一房地產公司做辦事員，隨後到倫敦，加入社會主義者的集團費邊社 (Fabian Society)。在那裏他爲了宣傳社會主義，寫過不少的政治、經濟論文。但自一八八五年以後，他時常在報章雜誌上發表藝術、音樂、戲劇的批評文字，同時他的興趣漸漸轉移到劇本的寫作上面。快意與不快意的戲劇集 (Plays: Pleasant and Unpleasant) 和人與超人 (Man and Superman) 諸劇本出世，立刻使他在劇壇上奠定了永久的地位。作品富有幽默機警的意味，社會上通行的偏見、制度、習慣都是他攻擊的對象。

給蕭寫傳的赫理斯 (Frank Harris 一八五六——一九三一) 是蕭的老朋友，是愛爾蘭傑出的一位作家。早年在美國做過擦鞋工人、辦事員、和牧童，後來刻苦讀書，終於在大學裏舉了業。在英格蘭，他擔任過好幾處報章、雜誌的編輯。蕭伯納傳這部名著在他去世的那年完成，校訂和付印等事是由蕭自己辦理的。

——編者

屠格涅夫青年時代的文學嘗試

莫羅亞作
吳且區譯

屠格涅夫出生於一個小地主的家庭，韃靼種的高貴的家庭。有人說，屠格涅夫的一位祖先是從亞洲來的。大約一四〇〇年的時候，在莫斯科軍隊裏服務。他的子孫有的做過統領，有的做過省長，後來他們的位分低落了。到十八世紀的時候，屠格涅夫家在歐利歐爾省（Orjol）裏，祇有着百來個奴隸，和一座叫作屠格涅夫（Tourguenievo）的村莊。屠格涅夫的父親，賽爾期·伊凡諾維支（Serge Ivanovich），是一個瀕於破產的馬隊軍官。

但是，一家之長在這裏卻不是那位為人父者。屠格涅夫的母親是一個路多維諾夫（Loutovitch）家的女兒，出生於一個不大著名而富饒的家庭。屠格涅夫很利用過他那可怕的外家，找出一些小說的材料。這是一個野蠻無禮的波爾嘉的種族。罪惡、亂倫的事。在他們的歷史上是層見疊出。屠格涅夫的外祖母，曾在瘋癱不能離床的時候，用柺杖打傷一個少年侍者，並且拿他在枕頭

下面窒死。屠格涅夫的母親承受了這種凶暴。她經過一個古怪的青年時代，在可疑的情況裏，和一個叔父同居，這個叔父死了，給她遺留下一大片土地，斯巴斯谷衣（*Spasskoié*），一筆財產，二十個村莊，和五千多個奴隸。

華爾華拉·彼德羅夫娜·路多維諾夫（*Varvara Petrovna Loubovinov*），有男性嗜好的少女，騎馬，帶着狗和槍打獵，在彈子房裏毆打男人。她是受過教育的，並且賦有一種頗高雅的文學嗜好。她後來問她的兒子道：「萊茵河的水是甚麼顏色？」回答是：「綠葡萄的顏色。」她有着兩隻美麗的眼睛，一個堅定的下頰，不過有一個發青而太寬的鼻子。熱情而有權威的她，也許願意接受人家的愛，但是甚麼都不能使她喜歡。她在斯巴斯谷衣的隣縣，遇見一個漂亮的馬隊軍官，賽爾期·伊凡諾維支·屠格涅夫，她雖然比他年長六歲。但是決意打算嫁他。進行一切的是她。他不大反對；一個沒有產業的軍官，不能毅然地抵抗一個帶來五千個奴隸的堅決少女。況且，他雖然儀表偉岸，卻有着那種可異的女人性格。在一八六〇年的時候，他的一幅小像是在斯巴斯谷衣掛着，屠格涅夫的賓客都覺得這位為人父者沒有丈夫氣，而帶着女人味兒，或者更正確地「很像一個穿

衛士的白色軍衣的蕩婦。」

「兩個蔚藍的眼珠是靜止的，神祕的，兩片嘴唇是多情而嘲弄的。」雖然他的祖先來自亞洲，他卻沒有亞洲人的特徵。一個屠格涅夫的人物說道：「我們這些人，生下來是金黃的頭髮，亮藍的眼睛，白的面龐。」屠格涅夫在初戀裏描寫他的父母的狀況：「我的父親，一個還年輕並且很漂亮

的男子，因為財產的緣故娶了我的母親。她比他年長十歲。她過着一種頗愁悶的生活；她永遠是煩悶、妒嫉、發氣，但是永遠不在我的父親面前顯露。她非常怕他。至於他呢，冷淡並且謹慎的，他保存着一種間隔。」

奇怪的結合，牠的特性在屠格涅夫性格的形成上顯有一種強烈的影響。他不但承受了那位上校的偉岸的軀幹，金黃的鬚鬚和明顯的柔弱，並且母親性格的粗暴，加倍地表現了兒子的天生的柔弱，消滅了他整個的意志。屠格涅夫夫人在斯巴斯谷衣拿自己看作一個小小的君主。她拿她的管家叫做「國務大臣」，拿那個送信的僕役叫做「郵務大臣」。她在那塊領地上置有自己的警察廳。在斯巴斯谷衣，和在那些中世紀的城堡裏一樣，具備所有家庭生活的必需品。屠格涅夫

人帶領着一隊真正的「臣民。」在那所四十多間房屋的兩廂裏，一邊住着織衣繡花的女奴隸，一邊住着音樂手和農奴。那時候，一個地主常常向一個隣人購買整套的音樂隊。那位屠格涅夫上校在那些女侍者裏面，挑選一些美麗的情婦。愁悶的，被欺騙的，笨拙的妻，華爾華拉·彼德羅夫娜在那些奴隸的身上報復。屠格涅夫在童年的時候，看見兩個鄉民，由他母親的命令，發配到西伯利亞去，——因為他們在園子裏走過她面前，忘了行禮。他後來指著一扇窗戶，給那些斯巴斯谷衣的賓客看，說道：「這是我母親在那裏坐的窗戶。我記得是夏天，那扇窗戶開着，那兩個漢子在發配的前一天，光着頭走來和她辭行的時候，我正在那兒。」

那些來教孩子們法文和德文的外國先生，和奴僕一樣地受粗暴的待遇。那些小主人可以和那些鄉民的孩子在一起玩耍，但是這些鄉民的孩子卻沒有回打的權利。屠格涅夫講過，他的母親看見了他和一個鄉童的枕頭戰，便非常驚訝，後來那個孩子挨了一頓鞭子。

那些在家裏的公子哥兒，那時俄國貴族的童年的象徵，同時感到在轄地裏目空一切，在母親面前無絲毫力量。那兩個小屠格涅夫，伊凡和尼古拉，差不多天天挨打。一八七三年，佛羅貝爾和屠

格涅夫一同吃飯，說起自己在路昂中學的時候，拿魯意十一的事寫過一齣戲；那些小民在戲裏說道：

「老爺，我們必需用我們眼淚的鹽拌我們的菜。」這句話使屠格涅夫想起了他的童年時代。他談起在犯了一樁小過失之後，挨了鞭子，罰了飯，「用一種苦趣，餓着從眼睛沿着面頰流到嘴角邊的鹹水，」在園子裏散步。

雖然這種家園的生活，他卻永遠保存着在斯巴斯谷衣的童年的愉快回憶。似乎俄國的風景，有一種不可思議的美，使見過的人拿愛情和遺憾保存到死。屠格涅夫永遠不會忘去那從山腰裏升起來的煙霧，那些樺、白楊、柳和這種蕎麥、裸麥，在清潔而乾燥的空氣裏飄散著的香氣。

那個孩子和鄉間長大的孩子們一樣，在斯巴斯谷衣學着辨認那些鳥、樹、葉子。他在這裏找到一些奇怪的師父來指導他，不但找到了自然，並且找到了詩。在一篇美好的短篇小說布寧和巴蒲林裏，他描寫一個同他坐在草地上讀詩句給他聽的農奴——詩的愛好者。

一些最近在俄國公布的書信，證明屠格涅夫上校也會教育他的孩子們。所有的信，差不多都

是寄給大兒子尼古拉的，但是這些信在我們眼前，現出一個不像初戀的角色那樣冷淡孤獨的人物。賽爾期·尼古拉維支·屠格涅夫盤問他的孩子們的生活：「你一定知道你的學業多麼使我關心……不要祇和我寫道：『先生們都很喜歡；我想着你的吩咐，』還要告訴我各種的事。譬如：法文、德文你讀「這個」；拉丁文、第幾、第幾；俄文：「那個」……同樣地歷史、地理我們讀到那一頁末了，算學我們學到「那個」，拿所有人家教你們的東西都這樣寫下來。也不要忘了音樂。」關於一個作家的造成，這一點是很要緊的：和那時候一大半人不同的賽爾期·尼古拉維支，希望他的兒子拿俄文寫得很好：「你們固執地拿法文和德文給我寫信，爲甚麼你們看不起你們自己的言語呢……是時候了，正是時候了！不但要能說話，並且要能殼用俄文寫一封信，這是免不了的。爲得要達到這個目的，你們可以用下面的方法寫日記給我：星期一用法文寫，星期二用德文寫，星期三用俄文寫，這樣輪流寫下去。」

一八二七年頃，全家搬到莫斯科，伊凡就在那裏讀書。莫斯科在那時是一個富有詩意的城市。冬天，在街道的白雪上，大家祇聽得見裹着棉花的馬蹄聲和雪車的私語聲。那些金色圓頂在寂靜

之上發亮的綵繪的禮拜堂，終屠格涅夫之生，在他的眼前出現。在十四歲時，他是一個溫和的、柔弱的、夢想的、愛詩句和文學的孩子。他很高大，有一點兒駝背。他進了大學校。人家要他在一張紙上簽字，要他承認不隸屬於任何的祕密社會。他簽了字。然而，因為對於家庭的反動之故，他成爲一個共產黨，並且在他的臥室裏掛上一幅富傑丹維（Fouquier-Tinville）的像。在他的周圍，他那些同學都自以爲是革命者。在莫斯科大學裏，那些農奴的主人，永遠被人看作猛虎或毒蛇。每天，下了課，在那些學生的臥室裏，圍着茶爐，大家談論着。大家對於那些理論的探討感覺興味。「請你們置身在一個五六個少年的集會裏，一枝蠟燭照着他們；大家享用一些變了味的茶和發了硬的點心。但是請望一望我們的臉，聽着我們的談論罷。狂熱在所有的人的眼睛裏發亮，臉龐都熱起來，心跳動着。我們談論上帝、真理、將來、人類、詩。不止一種天真的或者意外的意見忿出來；不止一種瘋狂，不止一種錯誤，激動着狂熱；但是痛苦到底在甚麼地方？請你們記住那痛苦所經過的愁慘的時代罷。」

*

*

*

*

屠格涅夫離開莫斯科，被人送進那個人家認爲更莊嚴些的彼得堡大學。那裏，功課是照着德

國的方法教授的，屠格涅夫也和他的同學們一樣，經過一個形而上學的刺激的時期。那時候，哥德，尤其是黑格爾是最時髦的。哲學的字典用一種神聖的曖昧遮住那些極簡單的行為。大學生們到梭哥朗基（Sokoljenki）那裏去致力於那種和宇宙合而為一的泛神論的情感。

在十七歲時，他開始寫一篇自傳：「剛剛十七歲，我願意寫下所有從我自己身上認識的東西，我的整個的生活。我爲甚麼這樣做呢？有兩個理由：第一，我剛剛讀過若望·若各·盧騷的懺悔錄，那使我發生寫自己懺悔錄的理想。其次，現在寫下了我的生活，我不打算再去摸這本冊子，一直到五十歲，在那時候找着了我今日所思想所憧憬的事，當然是有趣的。這樣地寫下我的開場白，我就開始了。」他沒有寫下去。

我們開始瞥見這個十八歲的屠格涅夫了，這個有着短小的姆指，孱弱的符號的男子。（他看着自己的姆指，說道：『有着那樣的手，怎麼去希望？』）他有着『這種天真地快樂而誠實的神氣，——初見時有點兒孩子氣，我們藉此認得出那些在大自然中長大的俄國原野裏的貴族兒童。一種有點游移的舉動，一種人家看着他的時候疑惑的微笑，末了，和善的性格、康健、柔輓、柔輓……』

他的父親死了，華爾華拉·彼德羅夫娜行使家長的職權。她和許多俄國人一樣，很看不起自己國裏的大學校。那時候，所有的科學都是從柏林來的。她決定送她的兒子到德國去肄業。

在柏林，他找着了一塊俄國青年的殖民地，斯當開維支 (Stankévitch) 為精神上的領袖。後來又加入兩個和他大有影響的人物：亞力山德爾·海爾生 (Alexandre Hersen) 和巴枯寧 (Bakounine) 海爾生——一個俄國地主雅各夫萊夫 (Jacovlef) 和一個浮爾登堡的美麗女子的私生子，(他們字以海爾生的名字為得表示對於他的誕生的關切。)——雖然還祇有二十四歲，已經因為他的論調而被逐出俄國了。巴枯寧，一個傑出而複雜的人物，在命運和性格上和屠格涅夫是非常相似的。和屠格涅夫一樣，是一個「巴林」(貴族)的兒子。在潑雷姆基諾的轄地裏，他的父親擁有一千二百個奴隸。巴枯寧也和屠格涅夫一樣，是一個偉男子。但是他那副喇嘛紋的面容，圍滿一大堆往後梳的棕色頭髮，比他的朋友粗蠢得多。他的少年時代是非常堅苦的。他背叛了他的父親，他的沙皇。他使他那幾個崇拜他的姊妹和他一樣狂熱——她們讀着若望·保羅 (Jean Paul) 和諾伐利斯 (Novalis) 以期待他，和他寫着熱烈的信。巴枯寧對於屠格涅夫非常

關切。至於屠格涅夫，有時傾倒他那個新交的雄辯，有時卻懷疑到一個柔弱的靈魂藏在他那個朋友的雄健的肉體裏，和他自己是一樣的。

在柏林的這幾年裏巴枯寧和海爾生一樣，還是一個溫和派。這些青年所奉爲老師的哲學家，是黑格爾。因爲黑格爾主張所有真實的東西都是合理的，他的學說承認歷史所造成的社會。那些屠格涅夫的新交，堅信創造是向着一種神祕的結論走去的，並且堅信歷史祇是人類理性的開展。倘使一個從急進黨裏走來的朋友說：一個餓丐足以破壞自然的和諧，那些黑格爾派的哲學家就答道：「即使我們不了解一種特殊的情形，我們可斷言精神和理性在宇宙裏主宰着。」

人類差不多永遠要求一種對於他們的情感和行爲的合理的辯護。一八四〇年的那些俄國青年，拜倒於一個明知是專制的君主之下，他們在黑格爾的法律哲學裏，替他們的忍耐服從，找到了口實。人家和他們說：國家是一個活的有機體。歷史使牠如此的。一個個人，一個團體不能夠照着自己的想像變更牠。「因此，絕對服從沙皇的必要，就沒有討論的餘地。」

右傾的黑格爾主義既是那樣，但是海爾生已經發現，在同一的黑格爾裏，我們可以找出所有

攻擊獨裁的正當論據。因為倘使所有真實的東西都是合理的，那末那種革命者——真實的東西，也參與歷史的計劃了。『倘使存在着的社會秩序是可以用理性來辯護的，那末，當牠存在的時候，所有攻擊牠的鬪爭，也可以用同樣的理由來辯護。』一種左傾的黑格爾哲學便這樣地產生了。再進一步，似乎當人類拋棄了具體真實的強固支點的時候，他們便言而無物，並且那種語言——工具，不應當變成宗教。康德說：『身輕的老鴉，也許以為在真空裏會飛得更省力些。』

似乎屠格涅夫在參與這些精神的宴會的同時，永遠保存着和土地的接觸。他在那時候，拿一些對於愛情的神祕質的激越理想，混雜在一種頗平凡的放蕩生活裏。關於那件事，他奇怪地受了他母親的鼓勵——她要他拿他的私生活和她商量——她和他寫道：『你是我的星。我的生命在你的身上。』她在日記裏面，寫道：『若望是我的太陽；我除了他甚麼都看不見。當他晦蝕的時候，我也看不見了。』有幾次，她和他寫道：『我的親愛的女兒，我的若望妮，你是我的愛女。』在男性的母親和女性的兒子之間，角色的反串是道地的。當他找着一個四十歲的情婦時，他的母親表示十分滿意：『我永遠爲你希望一個有經驗的中年婦女之愛。教導青年的都是那樣的婦女。利益是雙

方的；女人可以自傲，男人得着經驗的好處。『她是男性到了犬儒哲學的地步。可是她的兒子，在那聚在桌上頗似斯巴斯谷衣的乾草簇的煙葉堆裏，不斷地談着黑格爾，並且那些柏林的大學生喝着華爾華拉·彼德羅夫娜供給她愛子的茶葉。

在二十二歲，他從德國回來。他快樂地重新找到了那些池子、天鵝、老僕從、亞蘇和蕎麥的香氣，灰白色的樺林。他本來是打獵的老手，於是他立刻又搨起他的鎗。有比春日黎明之前，在俄國原野裏走路更高興的事嗎？『您走出家門，站在階沿上……在那灰暗的天上，還有幾顆星耀着；大家聽得見那種夜的斷斷續續的私語；那些被黑影籠罩的樹溫和地響着。那些套在車上的馬抖着，打嚏，嫵媚地頓蹄；慢慢的，靜靜的，一對剛剛驚醒的鵝穿過小路。您坐在座位上；那些馬匹突躍前進，車子震震地駛去……一片輕霧在池子上面浮動。清新的寒氣襲進您的身上；您拉起外套的領子，於是您可以在一種溫和的假寐裏聽其所往……可是天漸漸地亮了；天上已經有了些金色的長線；一些水氣在低洋處浮動……一切是新鮮的、快樂的、有趣的……讓胸脯自由地呼吸罷，讓動作自在

些兒罷，生物是多麼被春的新鮮氣息所鼓舞呢！……」

*

*

*

*

在伊凡·賽爾格維支·屠格涅夫的生活裏，要去做些甚麼呢？他願意成爲哲學教授；他不久又拋棄了這種志願，和其他的職業一樣。他的母親想得很好，要他祇是一個閑散的人：『你甚麼都不願意做嗎？上帝保佑你。甚麼都不要做罷，你愛怎樣就怎樣地安然生活罷……你愛寫作、散步、打獵、旅行嗎？誰阻止你呢？在彼得堡去過冬、消遣、看戲。春天，回到鄉間來；夏天，我們旅行去。秋天，你去打獵。活着，並且讓我們挨著你活著罷。』

但是挨著她活著是不容易的。在漸漸老衰的時候，她變得激烈而粗暴了。倘使她在復活節那天醒來，不高興，她會不許二十個村莊的教堂打鐘，並且因爲她不能慶祝聖週，那一年沒有一個人是能慶祝聖週的。在一個幾俄里遠的村子裏，有一種她所愛喝的湯，她叫人用驛馬送來，爲得湯可以滾熱地送到。那個民主思想的伊凡，常常因爲農奴的緣故和他的母親衝突。然而他永遠是屈服的，並且很容易地認了輸。

他設法脫離了這位『母親大人』到彼得堡去，在交際場中生活，並且演著修玄 (Don Juan) 或曼夫雷 (Manfred) 的把戲，因為他本來是拜輪的偉大的讀者，並且他自己也是很浪漫的。人家不很注意他的浪漫主義。這位怯弱的修玄使人家發笑。阿南柯夫 (Annenkof) 說：『在他身上，有著一種決斷和謹慎，大膽和計算的配合。』他寫着一些詩句、詩劇、劇本。他滔滔地和批評家皮藍斯基 (Belinsky) 爭辯著西歐，爭辯着俄羅斯。那裏也和大學校裏一樣，大家談着、談着……皮藍斯基在爭辯了六小時之後，嚷道：『噢！我們還沒有知道上帝是否存在，您卻想吃飯了嗎？』

在那時候，彼得堡的文場中人分成兩派。那些斯拉夫主義者希望在俄國靈魂的精華裏，找到哲學和藝術的材料。『在斯拉夫主義者看來，俄國的一切都是可贊美的，神聖的：正教，俄國的生活，俄國的藝術……憑上天的保佑，俄國應當像燈塔似的去領導人類摸索的前進。』反之，那些西方主義者，主張俄國應當以西方為師。屠格涅夫，柏林的大學生，希拉的偉大的讀者，若瑟桑 (George Sand) 的贊美者，比較喜歡加入那些西方主義者裏面。他的角色波士金 (Potougrine) 說：『我在今年春天去參觀倫敦的水晶宮，在這座宮殿裏，您知道，陳列着各種發明的標本——這可以說

是人類的百科全書。我在所有這些機器、工具、偉人的肖像中間散步，於是我被這種思想纏住了；倘使一個國家忽然從地球的表面消滅，倘使這個國家所發明的東西也同時隨着這座宮殿消滅，我們的親愛的母親，正教的俄羅斯，會絲毫不動地鑽進地獄裏去；一切會安靜地停止不動，因為茶爐、長靴、鞭子——更說不上重要的工業品——都不是我們發明的。」

在那些斯拉夫主義者的眼裏，歐洲的文明已是老衰了。俄國是唯一有希望的青年國家。在那些西方主義者看來，俄國是和傍的國家一樣老衰的國家，而且是一個弄壞了的國家。在兩派之間，仇恨是很深的。

雖然覺得自己是近於西方主義者，屠格涅夫卻不參加黨派。在政治上和在愛情上一樣，熱情不是他的長處。他是一個大公無私的觀察者，不能不看見一些敵人意見的真實部分。他不喜歡黨派的虐政。他說：「一個談話會拿爭論代替了談話，使人們白費口舌……牠使他們失去了靈魂的鮮之氣和堅定。一個談話會，這是以友誼和親愛為名的單調和厭惡。這是以誠實和同情為藉口的誤會和誹謗的混合。」但是，在用一種刻毒的正確去分析談話會的短處時，他卻頗願常常走入

那些比較進步的談話會裏。

在一八四三年至一八四四年的冬季，那個意大利歌舞團，在許久以前曾被人從彼得堡趕走，現在重新開演了。在那些歌女裏，從前叫作坡林·夏爾西的坡林·維亞爾多（Pauline Viardot）來了。她出生於一個擅長音樂的家庭。她的父親，曼尼爾·夏爾西（Manuel Garcia）是一個西班牙的大歌者。當坡林第一次開唱的時候，她的姊姊瑪利·斐利西·瑪利百蘭（Maria Felicia Malibran）去世已經三年了。愛過瑪利·斐利西的繆賽（Musset），以為在她妹子的歌喉裏聽見了姊姊的歌聲。他也追蹤過這位妹子，但是那個『沒良心的坡林』拿他撇開了，嫁給了那個巴黎的意大利劇場經理魯意·維亞爾多。這次結婚是被若瑟桑慫恿而成的——若瑟桑很愛坡林，並且一定用她做那本孔蘇羅的模範。坡林·維亞爾多並不美。她的彎曲的背，突出的眼睛，粗的面紋，她竟是頗醜的，不過這是一種動人的醜。亨利·海納（Henri Heine）拿她比作一個怪形的外國景緻。她和維亞爾多定婚的那天，一個比利時的畫家和那位未婚夫說：『她是醜得不堪，但是，倘使

我遇見了她，我會愛她的。」

她在彼得堡的成功是無限量的。大家祇談着意大利歌舞團，那些大學生爲要得着坐位，聽那個「破天荒的維亞爾多，」冒着生命的危險，在那還沒有凍堅的冰上穿過耐華河來。

一八四三年十一月一日那天，屠格涅夫被人介紹給她了。這一天於他成爲一個神聖的紀念日，他每年慶祝牠。她在那時候還不拿他當作一個重要的人物。大家也許告訴她，說他是一個打獵好手和一個惡劣詩人；但是固執的行爲在女人看來是一種偉大的美德，並且屠格涅夫是那樣的忠實，結果他能够每晚在演戲之後走進那歌女的屋子。在這間屋子的地板上，鋪着一條大白熊的皮。穿着白色浴衣的坡林，坐在中心。挨着她坐在一條熊腿上的權利是一種無上的光榮。那熊皮的四條腿是分配給四個人的：一個將軍，一個侯爵，一個帝國劇場經理的兒子，和那個幸福的屠格涅夫。屠格涅夫的這條熊腿是第三號。每個座客，在休息的時候，必須給維亞爾多夫人講一個故事。大家猜想屠格涅夫對於這種遊戲是很容易拿她從那三個人手上奪過來的。

屠格涅夫對於維亞爾多夫人的熱情不多時在彼得堡已是盡人皆知了。他和所有的人談

着那件事，這個偉男子的掌聲每晚都劇烈地擾動了觀衆。來年的夏天，他第一次旅行法國，到古爾塔佛納（Courtauvail）別墅去拜訪維亞爾多夫人。在那裏，他成爲魯意·維亞爾多和一些小孩子的朋友了。要知道他是不是維亞爾多夫人的情人，卻很困難。魯意·維亞爾多當然不是一個愜意的夫婿。但是他能够不知道事實。總之，不論是愛情或者是友誼，從這時候起，熱情充滿了屠格涅夫的生活。因爲第二年坡林不回到彼得堡而到柏林去，他也到柏林去了。後來他跟她到德來斯德，並且重新和她回到古爾塔佛納。

那別墅是在柏里地方，離巴黎六十基羅米達。屠格涅夫在這裏找到了他所愛的女人，好聽的音樂，野獸的肉。他在那裏過了一夏。這情形在一個法國人看來是很奇怪的，也許在一個俄國人看來是不足爲奇的——一種無限度的款待，在俄國是成爲習慣了，在多數的人家，拿外人像養子一樣的放在家裏。——冬天是維亞爾多家巡迴獻技的時候，屠格涅夫在巴黎離王宮不遠找了一間屋子，並且天天去看那位他叫她作「媽媽」的坡林的母親，夏爾西夫人。

在世界上，於他祇剩下坡林，坡林的家，坡林的位分了。每天，他拿所有的事寫長信給她。他指導

她讀書，和她談着『她在纖巧和嫵媚裏藏着的正直、純潔、莊嚴的靈魂……』。他和她描寫在提勒里故宮的散步：『我看見一羣小孩子在那裏玩耍……他們那些幼稚的親熱狀況，他們那些被冬天的初寒凍紅了的小臉兒，保姆的平易而溫和的神氣，那穿過許多大栗樹的美好的紅太陽，那些塑像，那些睡着了的池沼，那提勒里宮殿的莊嚴的暗灰色，所有那些東西，使我無限高興，並且使我在一早晨的工作之後恢復新鮮的氣力……您記得那一天我們望着在白楊樹的金色葉子之外的天空嗎？……』『我在這裏過着一種使我高興的生活：天天早晨，我工作；到了兩點鐘，我出門，我到媽媽那裏去，我在那裏逗留半個點頭，然後，我閱讀報紙，我散步；飯後，我看戲去，或者再到媽媽那裏去；末了，我睡覺，那就是……』尤其是他對於她的藝術，貢獻了些最聰明的指導。

當坡林在遠方的時候，屠格涅夫最快樂的事，是在報紙上讀着他那個女友的成功的事。一天，當維亞爾多家在英國旅行的時候，他一個人在古爾塔佛納，他曾經把沒有錢的事和坡林的姑母說過，她送給他三十個佛郎。他用這筆錢到巴黎去，在那些英文報裏讀倫敦坡林音樂會的節目。在別墅裏，大家開始覺得他有一點兒礙事，但是屠格涅夫不明瞭，他寫信給坡林：『他有了甚麼呢，

維亞爾多？他是否厭煩我在這裏呢？……我是可憐地蹲着，好像一隻感覺到譏刺的狗，一隻被日光照昏了眨着眼皮，茫茫地用眼角窺看的狗。」

一八四七年至一八五〇年，在法國長期居留的時候，屠格涅夫工作得很勤。在他從俄國動身以前，在一本雜誌裏發表過一篇短篇小說，黃鼠狼和卡利尼奇。這是一段兩個鄉人的簡短的談話，但是這段談話使所有讀者被牠的真實感動了。在這些被許多俄國知識階級當作獸類一樣看待的農奴裏，屠格涅夫揭露了一種情感的結合和一種異常的纖巧。人家請他再寫些傍的小說，於是在同代人的雜誌裏，他在一八四七年又供給了八個短篇。成功繼續下去。他敘述他在斯巴斯谷附近打獵時候所見的事。在表面看來，再簡單沒有了；這是一些俄國的典型，一些貴族，管家的人，鄉民；一些森林的，平原的，黃昏的風景。但是那些最好的批評家都認為是一種不可限量的藝術。每個敘述是正確的，並且線的選擇是美妙的。

那些情節是幾乎站不住的。一夜，一個獵者迷了路，在霧裏遇見一所在草地裏牧馬的鄉下孩

子們的露營。孩子們整夜講着一些俄國鄉間的神話，早晨，大家分別了，如此而已。但是這篇小說，貝新草場，是一件傑作。那種夜的美和沈寂是描寫得再好沒有了。一個獵者在森林裏坐下；因為他被樹枝子遮住，兩個鄉民，一男一女，沒有看見他，在他身旁爭論。那個男的走開了。那個女孩子一個人待着，哭着。那些幾乎看不見的人物都是活着的；他們的悲哀是和這種自然的悲哀相混。這便是那篇約會。那個作家因為斷了車軸不得已停了一個有點妖氣又有點詩趣的老鄉民的門前。這便是卡西央。一個老侍者誇耀着主人的榮華富貴，同時一個鄉民自怨他的苦命，這便是那篇香梅水。用一種很熟練，很隱祕的藝術，屠格涅夫能拿自然的獨立的美攙雜在人類的艱苦生活裏面，並且在他作品的周圍創造一種無限沈默的領域——那些最微小的事物在這領域裏都用一種驚人的銳利發出回聲。風景的品質是極美妙的。永遠沒有人像這樣敘述過一些樹木和葉子。『在我的頭上，那些葉子微微地動着，但是這種微小的聲音是足夠說明季節的。這既不是春的快乐而笑語的顫動，也不是夏的溫和而遲緩的怨訴，也不是暮秋的怯弱而清爽的私語，但是一種睡夢中的嘮嘮叨叨……』這是一個在自然的懷抱裏生活過的人的描寫，而不是一個「只為探取祕密

而去拜訪自然』的小說家的描寫。

但是，最感動那些俄國讀者的，是那種對於奴隸制度，尖利而暗示的間接諷刺。屠格涅夫比一個專為發揮宗旨的藝術家高明得多，況且，倘使他發揮了宗旨，那末，文字的取締，也許會禁止他那些小說刊行。但是拿一些鄉民做主角，使這些不為人所知的人物和善地談着的事實，已是一種批判了。他拿他們描寫得可愛，合理。他揭露他們的生活條件的惡劣，管事者的可惡，地主的愚昧。他描寫這種強迫女奴澈夜歌舞的酗酒貴族：『倘使她們露了一些倦意，他便自己用兩隻手捧住頭，歎息道：『啊！可憐的，可憐的我！人家不理我了……』於是那個馬夫用鞭子刺激那些女人。』一個西方人，或者一個受過西方思想薰陶的俄國人，讀了這些小說不會想不到那樣野蠻的狀態是不能持久的。

這是可異的，倘使注意到屠格涅夫那時雖在法國，他卻祇在俄國的回憶裏尋找小說材料，一八四八年革命，在西歐掀起的思潮，也許足以使他想起柏林的朋友海爾生和巴枯寧，可是不大使他發生興味。暴動的那天，他僅僅記載那煙酒小販在羣衆裏打轉的冷靜態度。藝術家，小說家，不過

是一個觀察者。那次革命的失敗，使他的許多俄國朋友失望，於他卻是不相干的。他沒有那種信念。「誰說人類是可以成爲自由的呢？歷史證明了反面。歌德並不是用一種佞臣的頭腦寫出他那句名言：「人不是爲自由而生。」這祇是一種事實，一種用正確的觀察者身分說出來的真實。」

一八五〇年，屠格涅夫決意回俄國去，雖然對於他的母親不無怕懼。他這次動身，遲延得很長久。「俄國在等候着。這個蒙面的碩大而灰暗的臉面，和愛諦普（Oedipe）所遇見的怪物一樣，不久會拿我吞下去。我相信看見牠在用一種憂鬱的注意向我矚視，的確是一些石頭的眼珠。請你放心罷，斯芬克斯，我會回到你那裏去，倘使我猜不出那個謎語，你可以隨便拿我吃掉！讓我在和平裏再待些兒時候罷！我會回到你的荒野裏去！」

末了，他決定了，並且在動身的時候，和維亞爾多寫道：「我的親愛而和善的朋友，我不願意不和您說明我是多麼愛您，贊美您，而離開法國，我是多麼不滿意這次不得已的分離……祖國當然有一些權利；但是真正的祖國不是人家於此找着更多的愛，心和靈魂於此得着更多的快樂的地

方嗎？在地球上，我沒有比古爾塔佛納更愛好的了。」

華爾華拉·彼德羅夫開始熱烈地等待她的「若望妮」。後來，當他一再遲延，拿他的生活連接在這個半法國人半西班牙人的歌娘身上時，那位斯巴斯谷衣的暴君發怒了。她那兩個兒子竟先後跑掉了，脫離了這個她希望於此管理他們和他們的妻子的家庭。在大路上，她會叫人築起一塊碑，刻着這幾個字：「他們將歸來。」但是他們並沒有歸來。末了，當伊凡從巴黎回來的時候，她起先待他頗好，但是不久，她和她那兩個兒子之間發生了權利的爭執。她收養過一個女孩子，他們拿這個女孩子趕走。她因為專制拒絕給他們錢；他們離開她走了。尼古拉到屠格涅夫去，在他父親的產業裏生活，伊凡也跟着他去。

他的母親在莫斯科的老家裏死了。臨死時和平時一樣野蠻，一樣專制。她除了一些葡萄酒和冰塊之外甚麼都不吃。她唯一的事，是在床前一本簿子上寫些刻毒的字句。屠格涅夫給坡林寫道：「她的末日是悲慘的，語天主不要給我們那樣的死罷。她祇想法子弄昏自己。她死的前一天，她的氣息僅屬，一個音樂隊奉她的命令在隣室裏奏着波蘭歌曲……我的母親在臨死的時候，甚麼也

不想，我說起來都慚愧，祇想使我和我的哥哥破產。」弟兄兩個分析了田地。斯巴斯谷衣成了伊凡的產業。那位新業主對於家裏的人是很寬大的。然而他並不想法子去解放他的鄉民；他為難地占有着他們，但是他不耐煩實行，凡是重大的決心都使他害怕。況且，大家在他的田地裏是並不太苦的。農奴們極力偷竊這位「瞎主人」——因為他的眼鏡，所以他們這樣稱呼他。他自己說，有一天，他的車子在大雪的地方停住了，他因為停得太久覺得奇怪，便在窗子裏張望，看見他那兩個奴隸，馬夫和跟車的人，在那裏玩紙牌。屠格涅夫一聲不敢響，拿頭縮回車廂裏，等候那局牌終了。這是奴隸身分的一種和平狀態。

他現在在莫斯科生活。他的小說在這裏得着極大的成功，並且他成爲一個交際場中爭相羅致的時髦人物。他寫出一些喜劇給人家表演。——一些使人同時想起果爾爾的巡按使和法國十八世紀短劇的頗有興趣的妙語。這是一點兒東西，但成功卻是非常的。此時已經出版的獵者的回憶，是一本很大膽的書，似乎能使屠格涅夫在青年時代無愧色的。——見屠格涅夫

屠格涅夫(Ivan Sergeevitch Turgenev 一八一八——一八八三)是俄國名小說家、詩家。生於中部俄羅斯一個貴族的家裏。少時在莫斯科，聖彼得堡等地讀書，最初寫詩，散文作品多以同情的態度描寫農奴的生活。一八五二年他因為做文章哀悼文豪果戈爾(Gogol)之死，觸犯俄皇，監禁了一個月，又放逐到他的故鄉斯巴斯谷伊。自此以後，他流浪國外，奔走德、法二國之間，終於在法國去世。他的小說作品以父與子（商務有中譯本）最為膾炙人口，晚年所作散文詩靈是琳瓊佳製，至今傳誦。

寫屠格涅夫這部傳記的莫羅亞 (André Maurois) 是現代名小說家、傳記家。一八八五年生於法國的愛爾波城 (Elbeuf)，做過工廠經理，歐戰時在英國軍隊中做過軍官。自他的雪梨傳出版以後，他便一躍而為文壇的巨子，以小說筆法寫傳記在現代可說沒有比他更成功的。

——編者

法拉第傳二章

克勞塞作
周昌壽譯

一 幼年時代（一七九一一八一三）

十九世紀的第二個四分之一，要算是科學界呈空前盛況的時期。力學的基礎已由牛頓奠定，其結構的大部分，均已完成。幾何光學的殿堂，亦已建立，僅其同伴物理光學，尚未開始而已。言及電學的宮殿，在當時甚至連地面也還未曾加以測量，奠基更說不上。可是到了現在，其富麗堂皇達於極點，而經過的時間空間，卻又極其簡短，令人對於參加建設者，只有驚嘆其爲「鬼斧神工」而已。頗有不少的石塊，安置得恰當而又切實，在他們上面鑄着的名字，足以永垂不朽。其中有許多最大的石塊，都鑄着同一的人名，這個人名就是邁克爾法拉第（Michael Faraday）。

最近有許多電學的應用，都是根據着他的發見，其來源要都出於他那豐富的腦力。現在使街

頭室內照耀得和白晝一樣，使電車在馬路上往來如織，使電動機運動不息的電流，就是經他的手，纔出現於世的。在醫學上應用的電流，也以法拉第電流爲其主要。還有那遠隔重洋傳遞消息的無線電，推原其始，雖非出自法拉第的實驗，也當歸之於其思想。就是那些在碗櫥內食桌上面光耀奪目的鍍金器皿，也不免有一些地方和他有密切的關係。

*

*

*

*

邁克爾法拉第 (Michael Faraday) 誕生於一七九一年九月二十二日，地點在薩立 (Sally) 的紐因敦 (Newington)。法拉第的家系，本出於北方民族，他的祖父母住在一間灰色石造的農家裏。這種房子，周圍有鐵樹護着，現在在盆嶺山地 (Pennine Peaks) 周圍的荒涼原野上，還有這種房子點綴着。他的父親是一個鐵匠，隨着同業到了南方，最初住在紐因敦，後來（當邁克爾五歲的時候，）移到倫敦，在雅谷院 (Jacob's Yard) 近傍的馬號地方，一家馬車行的樓上，租了幾間房間，就住了下來。

據保存下來的他的幾封信札推察起來，可以想見他的父親是一個很勤苦而又熱心宗教的

人，屬於一個很小而又沒有努力的教派，即是桑提曼派（Sandemanian）。他的祖先就屬於這一派，後來邁克爾本身也成爲這一派中的活動分子。他的父親因爲身體不好，不能夠按日工作，弄得來家庭生計極爲困窮。並且當時的勞工生活，本來也就萬分艱難的了。以拿破崙爲中心的戰爭，使歐洲人民的困窮，有增無已。食料缺乏而又奇昂，四個孩子正在成長，所以有時要使個個吃飽，實在不是容易的事。據邁克爾自己的記載，他的父母每星期僅給他一個麪包，要他省儉作一個星期的糧食。

關於他幼年的讀書生活，雖然應該知道一些，可是差不多無從查考。當一八〇四年即是當他十三歲的時候，他被在布蘭埠街（Blandford Street）的一個書店雇去作跑街。那個時代的報紙，要算是一種奢侈品，只有極富裕的人家，纔能購買，通常都是租來看的。法拉第的一部分職務，就是將這種報紙送別租看的人家去，到了租期完了的時候，又去收回來。他最初記載的實驗，就是在這個時期做的。當他將租戶的門敲了一下，靜候着開門的那一點短時間內，忽然發生一個疑問：「假使我的頭在欄杆的那一邊，而我的身體卻在欄杆的這一邊，那麼，我應該說是在欄杆的那一

邊纔對呢？」本着他所秉賦的特別能力，以及對於實驗的特別傾向，於是他就實行去試驗一下。不料這時門突然打開，這個青年哲學家，未曾注意到，急忙將頭縮回，已經來不及了，被門結實碰了一下。而這個問題遂一直留到現在，依然沒有解決。

法拉第永遠沒有忘卻他的早年的經驗，每逢一想到他做送報人的事情，必定感到一種無上的快意。同樣，他幼年對於父親的鐵匠工作上所發生的興趣，也一直保存到他晚年。他在一八四一年的論文中，還這樣的說：「我很喜歡鐵匠舖，以及關於鐵匠的一切事件。我的父親就是一個鐵匠。」

她在商業階級最下層的時期，並不甚久。翌年（即一八〇五年）他的主人利保（Riebeau）命他去學習裝釘書籍，同時還兼做賣書的職務。他那契約中有一句值得記住的，就是「因為他服務很忠實，所以免收學費。」

法拉第就在他裝釘的書中，得到了他對於科學原理的最初的認識，想不到後來科學的原理，卻由他發揚光大。他從許多冊數的大英百科全書中得到了關於電學的最初的觀念，他從一冊名

叫 Conversation 的小書中，得到了關於化學的最初的知識。在當時這種小書還是高等文人的
一部分重要的文獻。就在這個時代，處着這種惡劣的環境，他已經表現出對於事實的熱情，和對於
任何有名的權威，不肯輕於置信的特性。他後來的科學研究，都具有這樣的特性。這些作者的結論，
只要是在他能夠實驗的範圍內，沒有一種，他不去親身研究。他的實驗方法並不多，但總是反覆不
已的去。在這個時候的零用錢，只要能夠節省下來，他都拿去購求他的科學研究所要的材料，常
常還要將食品室內的東西拿來補充。每要將白晝的工作做妥當了以後，到了深夜，方能夠開始
他的實驗。因為管家的忘記了裝滿鹽碟，往往害得他的實驗不得不延期。

法拉第一面釘裝一面賣書的這個職業，不但使他容易接近當時絕無僅有的科學文獻，並且
使他和教育界人士接近。他從其中的一位，得到一張聽講券，去聽一個化學講演。地點在皇家研究
院 (Royal Institute)，講演的人是德斐 (Sir Humphrey Davy)。這位熱誠的青年，居然能夠
親眼看見當時最負盛名的化學大家，並且能夠親耳聽見他的談話，其喜悅的情形，不難想像而知。
他將所聽得的講演筆記出來，完了之後再用一冊四開本的雜記簿，將他臆清。其中凡是可以推廣

的部分，他都加以補充，又附加了許多插圖，表出講演時伴同做過的許多實驗。在辛苦了一天之後，還要做這個工作，這決不是不足道及的。

這個時候（一八一二），他的學徒的期限，業已滿期。在另外一個人名叫拉羅希（De La Roche）開的書鋪裏面，去做正式的裝釘工人。這個新主人是一個喜怒無常的人，所以法拉第對於這個新位置，並不感覺快活。脾氣雖則奇怪，可是這位新主人，對於他的這位青年助手，卻有一種真摯的情感。至少對於他的能力和價值，認識得很清楚。所以約定只要法拉第繼續幫他下去，他就使法拉第將來承繼他的這個書鋪。

可是法拉第對於科學的熱情和對於職業的厭惡，愈來愈甚，所以決定下來，只要能夠辦得到，他一定放棄這個安定的商業，而去追求那既不可靠且又決不能生產的知識。雖然沒有私人的關係和努力，可是他仍然決定向德斐進行。他和德斐雖然相隔甚遠，但卻對他心悅誠服。他費了許多心力，贖寫出來的那篇講演記錄，可以代替一封介紹信。他將講演記錄寄給德斐，並附一封信，希望得到一個有學術性質的位置。只要能夠使他從卑賤自私的職業，轉變到他喜歡的能夠使人成

爲和靄優美而又智慧的科學的職業，不問待遇怎樣的卑賤，他都滿意。這位老前輩化學家，接到他這種充滿熱情的幻想的當時，露出來的那種苦笑情況，不難想像得到。法拉第還不知道一個人成聖成賢，乃在於其內部的品質，並不在於他偶然從事的職業。科學的追求雖極神聖，但也不免有卑鄙的目的，和用卑鄙手段去做的。

德斐對於這個異乎尋常的要求，好像很爲躊躇一下。據說他去和研究院的一個管理員商量如何作答，管理員說：「叫他來洗洗瓶子，假使他還有點用處，他一定做得不錯；要是他拒絕不來，那就是沒有用的廢物了。」假使果然照這樣辦，法拉第一定會接受的，並且瓶子也必定會洗得很乾淨，這是無可容疑的。可是他的那樣熱誠，卻不能受這樣殘酷的試驗。德斐的態度很誠懇，和法拉第面談一次，明白的對他說（就是現在對於熱心的青年，也還是這樣的對付），科學好比是一個性情古怪的女子，你儘管對她掏出滿腔的熱血，可是她對你的報酬，卻極其渺小。又對他說，他現在已經熟習了的職業，可以使他得到安全的舒適和成功，同時還許他包釘院中全部的書籍。

可是法拉第既不畏難，又不爲利所誘，要想他改變方針，卻辦不到。他對於科學的嗜好，是超乎

一切世俗見解以上的熱情。幾個月後，碰巧研究院的實驗室，有缺空出。德斐就將他補上，他立刻就接受了這個位置。這一次決定委任法拉第的會議錄，是值得我們將牠抄出來的：

「德斐爵士知會管理員，已經覓到一個人希望填補威廉培恩 (William Payne) 所遺留下來的缺。此人名叫邁克爾法拉第，是一個二十二歲的青年。就德斐爵士的觀察所及，此人頗能勝任。他的習慣甚佳，性情富進取性，且甚和藹；舉動聰明。」（一八一三年三月。）

這位威廉培恩要不是得到法拉第做他的後任，決不會為人知道的。法拉第補上了他的缺，每一星期的薪水是二十五先令。從此以後纔得投身入於科學界，後來竟成爲科學界中最偉大最光耀的明星。

德斐說法拉第對於研究室助手的職務頗能勝任，我們雖然表示同意，可是這個職務對於法拉第是否也能相稱，卻不能無疑。他在這個時期中寫的信，還有一些保存下來，從他寫的信上，可以將他的爲人反映出來。不僅天賦的生氣和智力，遠超出常人以上，就是通常認爲是後天的特性，如嫺雅、修養，以及優美等類的品格，也都遠在一般人之上。不僅這些性格的生動和正確，與衆不同，還

有他們所表現出來的思想，其磊落懇摯謙恭，更有甚焉。這個時期德斐正在研究氯的元素本性，引起了全科學界的深切注意。舊時認氯是一種氧的化合物。贊成德斐的人，則堅持是一種元素。在此兩派之間，遂發生了異常激烈的論爭。法拉第的信札中，全都是寫的這件事。其中有一封信，是寄給一個還在懷疑的友人，解釋德斐的見解。由他那種解釋的方式，可以表現出他對於本題的領會能力和說明的透澈，條理的整齊。因為有這些特性，所以使得法拉第後來不僅成爲一個異乎尋常的發見家，並且同時還是一位出類拔萃的講演家。

他那信中寫着：「我這樣熱心信奉這個新學說，毫不足怪。我親眼看見德斐本人擁護牠。我還見過他做出許多實驗來，確證和解釋，我聽見他應用這些實驗去說明這個理論，去助長這個理論。確信使我不得不服，由信服而欽佩。」

可是他的那位朋友，誤會了他的意思，將他所表示的見解，認爲是一種侮辱（這種感情就在科學辯論中往往也會發生的），所以他給法拉第的回信，極爲憤慨。在法拉第的答覆信中，可以看出這個人的性情。

「接讀本日來函，萬感交集，煩愁愧悔，尤爲不勝。我寫的信實在是受了他們的刺激，要想將當時我的情感披瀝給你。在我的信中前半段，你可以看得出我要我不說到氣的問題，我未能遵命，這確是十分抱歉的。只要有餘閑的時間，我常常的想起，並且拿出來一再的重讀，覺得很爲快活，可是一接到你的回信，真令我十二分的慚愧。在那一封長信的開始處，我會經聲明過我再提及這個問題的理由，現在想起來，實在是我那時的得意和自滿的心情，有以致之；恐怕當時我自以爲對於這個題目，具有超人一等的智識，纔會如此。現在既經明白了是這種情感作用，所以我不能不向你披瀝出來，希望將他加以抑制，俾能減輕一些。」

這就是接受皇家研究院助理研究員位置當時的法拉第，這就是他開始貢獻於科學界的天才。

二 科學訓練（一八一三—一八三一）

就是這樣，法拉第抱定了信仰，拿出他的勇氣，順從天命，開始了他內心所要求的人生歷程。他

的能力對於他酷嗜的科學上的職務，雖尚淺薄，可是當他還未會充分準備去完成職務以前，還有不少學習的機會。就在這個準備期間的開始，德斐就再有一次行動，供給他一個很好的機會，對於他不能不算是最大的益處。

在這一年（一八一三）的年底，德斐決定出外旅行，到歐洲各地的大學和研究所去，遍訪他那些最負盛名的外國同志，想利用各研究所使用着的種種不同方法，來做他自己的研究。他需要一個助手在旅行中幫助他的實驗工作，以及替他準備他期望的科學記錄。他為雙方的利益計，他請法拉第來擔任這個職務，於是在一八一三年的十月裏，他們就啓程到法國去。這一次的旅行，期間極長，差不多有兩年之久。他們經歷的地方之中，有巴黎、熱那亞（Genoa）、佛羅棱薩（Florence）、羅馬（Roma）、那不勒斯（Naples）及日內瓦（Geneva）等處，其中有一住數月，等德斐做完實驗，纔離去的。法拉第因此認識了許多當時自然哲學的泰斗，他們的名字，都是科學界耳熟能詳的。其中有安培（Ampère）、給呂薩克（Gay Lussac）、克力門（Clement）、得索爾姆（Desormes）及得拉利夫（De la Rive）等。這些人當中，當然免不了有幾位對於德斐帶來的這個青

年助手，不甚介意。可是也有幾位看透了他的價值並不在於其主人之下，因此結爲知交，直至於其晚年的。對於這位青年學者，這件事成爲一種鼓勵和快活的來源。不問是出於友誼，或是出於玄耀，總之，法拉第是得到了機會，直接去觀察這些人物博得盛譽所使用的方法。後來法拉第之成名，由於其獨特的實驗研究，其中似不無可以歸功於此次旅行的賜與。

在這一次旅行中，法拉第曾經記有一本日記，到現在還保存着。從這本日記可以看出他的興趣，他的觀察思想的能力是如何的廣泛了。上面記着許多的德斐的實驗，在他的助手看去當然是極爲得意的。關於地質方面的記事，也很常見，其中有兩篇登維蘇威（Vesuvius）山記，文長而又詳盡。不過法拉第對於科學的熱情雖極濃厚，到還不至於毀沒了他對於別方面的興趣和情感。自然界中森羅萬象，對於他都是一種不忍拒絕的要求。雷鳴、日落、瀑布、峯巒，無一不使他神魂飛越。對於人生百事，不單是一個很銳敏的觀察者，同時還是一個極同情的批評家。又記着法國的馬夫（關於他們的馬靴，寫得很正確而又詳細，法拉第的科學著作之所以得名，即由於此種作風），意國的乞丐（「乞食是近意大利的生存權」），以及羅馬的狂歡節，而對於狂歡節的記載，不僅

是一個旁觀者，而且還有點哲學家或其他的態度。他的本性絲毫也沒有遺世獨立的痕跡。只要來源正當而又不礙於其職務，他對於錢財並不鄙視，對於尋常朋友間的談笑，他也不故意離開。當他晚年的時候，每逢醉心於他的辭令的名家羣衆散會出門以後，必定有許多跳躍着的腳步聲，從上面法拉第的住宅，潛行進入，研究院的這一間大講演廳，立時就充滿了歡笑的聲音，我們這位大科學家本身就是其中最快活的一人。這種富於同情和心明神清的景況，就在幼年時代，也和在晚年時代一樣，成爲法拉第的最顯著的特徵。

日記中關於旅行的描寫也很不少，而且往往帶有幽默的風味。試舉其一節來看「由東地（Tondi）啓程，最初兩段路，是乘馬。我雖然不是一個騎馬家，可是也不能够單獨怪我，連人帶馬翻了兩跤，不過這樣的事情，在九英里中到也不常常遇見，略爲可怪而已。要是一個裁縫，他一定說這匹馬是一個宗教的信徒，牠所做的也就是一般意大利人在衰老的時候所常做的。我卻不以爲然，牠實在是一個畜牲，用牠的腳應該很整齊的走路。」

但是當時震撼全歐的政治問題，卻未曾引起他的興趣。拿破崙（Napoleon）從厄爾巴（El-

（log）逃走，也只不過是知道了而已。『聽見說拿破崙恢復了自由，我因為不是政治家，所以也犯不着去多操心。』不過這件事對於德斐的計畫，卻有很大的影響。德斐本來還想要到土耳其和小亞細亞去，因此不得不急急的取道德國和荷蘭，回轉英國，於一八一五年四月，抵倫敦。

法拉第立即從理舊業，做皇家研究院的實驗室助手，從此以後年復一年的埋首工作，忙個不了。德斐的活動到了極盛時代（他在這個時期中的研究，包含着有煤坑內的炸氣（firelamp）的研究在內，後來遂發明出有名的安全燈（safety lamp）。每一個實驗研究中所費的勞力，除非身與其事的人，無人能够想像得到。法拉第既是他的助手，所以大都是落到法拉第的身上。並且不久又兼做研究院中各個講師的助教，講演中要表演的許多實驗，都要他去準備。他應付這一部分工作的能力，不久就成爲人所共知的。誰的運氣好得到了法拉第做助教，那麼，他那次講演就好像是在絲絨上一樣，進行得又平滑又容易。可是要得到這樣的好結果，助教所費的時間就不少，往往爲單獨一個講演，就要用去五六小時的工夫。

同時法拉第更努力向各方面發展其智識。有許多的教訓，是他以助手資格參加講演會時，始行得到的。大部分還是由於自由利用圖書館而來。尤以和德斐以及常常到研究所中來的那些科學家，時時接觸，所得為最多。不過他的最良的導師，還是要他去做的那些實驗的本身。一個實驗裏面，包含着有活躍着的人格在內，這種人格是決不能用言語文字表現出來的，並且見仁見智，隨人而異。法拉第對於這一方面，感覺特別的靈敏，對於這種微妙的影響，差不多有一種靈感。只要是可能的，他總將牠捉住。凡能從記錄中得到的一切，他總認為不能滿意，必得要自己照樣去做一遍。對於由實驗得到的理論，除非是他親手做的，也決不肯置信。後來在一八二一年，他曾將當時關於電磁學的事項，記載下來，結果對於他所記述的那許多的實驗，都非一一親眼看過，竟連睡眠也將為之不安。

逐漸他的工作，不完全受人的指導了。智力和自信日愈增長，他也就分出一部分的時間來做他自己的創作，其中有些出於德斐的提示，有些則完全出於自動。他發表的第一篇論文，題為「天然出產奇性石灰之分析 (an analysis of natural occurring caustic lime)」登在一八一

六年的『科學季刊 (Quarterly Journal of Science)』上面，那時據他自己說，『正當我的恐懼心勝過自信心，並且兩者都勝過我的智力的時代；也正是我絲毫並未想到要寫一篇科學創作的時代。』這一篇小論文，登載了以後，接着又做了幾篇關於化學的論文。一八一八年他已具有充分的自信，發表了一篇『發聲火焰 (On Sounding Flames)』，指出聲望並不弱於得拉利夫的理論中的錯誤。每逢一位青年實驗家，覺到他自己居然能將人所容許的學說推翻的時候，無論在任何時代，也都是一件不尋常的事件。簡單的說，法拉第現在已經走上了證實他自己的理想的正道了。『哲學家應當對於任何提示，都要虛心去接受，但須自己去判斷。不應當側重皮相；不偏愛假設；不分派別；在正義上不服從他人。不能偏袒人物，要注重事實。應該要以真理為其最原始的目的。如更於此上，加上勤勉，那他就更有在自然廟堂榮光中高視闊步的希望了。』

一八二〇年要算是電學史上足資紀念的一年。奧斯特 (Oersted) 最初發見奇妙的電流和更奇妙的磁力間的關係。如果傳說尚可憑信，他是在無意中，發見了一條載有電流的導線，緊張

在一個磁針上面，磁針就會從本來的位置改變方向，不再指着磁北極了。這種從來認為毫無關係的兩個現象，竟會有了關係，引起了科學界全體的注視，無論何人，對於這個新穎而又奇妙的效應都感到興奮。由安培的睿智，窺見所有一切的磁鐵間的作用，只要配置得宜，無一不可從電流得出，科學界因此更為震動。

法拉第也受了這個奇妙的問題的吸引，所以也準備用他那慣常的小心翼翼而又有條不紊的方式，去盡力研究。於是如上所述，將關於本題的種種實驗，蒐集起來，並一一重做一遍，他關於電磁學進展的著述，遂於翌年（一八二一年）夏間，發表於『哲學年報（Annals of Philosophy）』。敘述完了他人的工作之後，繼之以他自己的實驗研究。在電流和磁極間作用的力，和當時已發見的任何力，均不相類，既非引力，亦非斥力，究竟這是一種什麼力，在當時卻苦於無法判斷。在法拉第卻捉住了事實，認為是實在的一種轉動力，並且使用很巧妙的實驗方法，果然能够使一個磁鐵，遶着一條電流不絕的轉動，使一條電流遶着一個磁鐵轉動。我們只要想到一個電動機也不過是在磁場內轉動着的電流，就不難判斷他這個發見的重要性了。電動機和法拉第創作的實驗所不同

的地方，不過是機構上細處而已。

曾經參加過早年實驗的一個朋友，曾經記述法拉第成功當時的欣喜情況。他說：「我決忘不了他的臉上所表現的熱情和他的眼中所發出的光輝。」事實上實驗對於法拉第，無論在任何時候，都好像兒童的快活一樣，不管這個實驗是出於他本人之手，或是出於他自己，甚至於到了晚年，只要見着一個新鮮的巧妙的實驗，他快樂得差不得要跳舞起來。可是關於電磁轉動得到的結果，使法拉第還得到更進一步的興趣，就是他還能夠去喚他的夫人到實驗室裏去參觀他的成功。因為在這個時候，他已經結過婚，並且帶着他的新夫人到研究院裏，和他同住。他有一冊記事簿，上面記着他的許多的獎狀、勳章、和榮譽等，在那裏面，後來他親筆記下這件事，其原文如下：

「在這些記事的當中，我要插入一個日期，這是榮幸的一個來源，而且遠超出其他一切來源之上。就是我們在一八二一年六月十二日結過婚了。」

可惜受了其他的職務壓迫，使法拉第不能立刻跟着他最初的成功，繼續研究下去。他還能夠自主，對於他的化學方面的能力，又有新添的工作。這個時期研究院的經濟發生困難，迫而出於利

用科學去改良製造，這是極其自然的一種誘惑，然而也是最致命的。對於這些工業研究，免不了要法拉第去擔負一部分，對於世界上真是一個極其重大的損失，簡直無法加以估計。或許會有一天，使當局者覺悟過來，知道研究應該和權勢獨立，從此種卑賤的學科不會得到多少好處，然而這種黑暗時代，一時還不會重放光明。在一八二一年法拉第開始做許多的實驗，想用別種元素和鐵做成合金，來改良外科器械中所使用的鋼，在一八二五年，又要去襄助研究院創始的與此類似的一種工作，目的在改良光學器械所需要的玻璃製造，此項工作一直繼續到一八二九年。對於這些工程上的問題，儘管浪費了不少的時間和腦力，但並沒有一種收到些微商業上的效果。雖然後來從他發見的合金中的一種出現了剃刀，可以算是法拉第的價值的一種表現，還有當他作製造玻璃的實驗時，從一片重玻璃，立刻引出了他的最深奧而又最富於啓發性的種種發見。總之，法拉第的天才，在應用科學方面，實在沒有充分發展。他的特長要到了知識的境界即是光明和黑暗接觸着的地帶，纔能充分表出。他長於發見而不是發明家。他自己會記着：「自己既不是一個製造家，要完成一種製造，我卻沒有這種勇氣出來保證」；在一八二九年，他正式具函皇家研究院要求自由，希

望順從他內在的光明，對於其他的問題，發揮自己的理想。

不過在這幾年裏，也並不是完全沒有收穫，在其他的方面也有不少的發見，要是比他略為遜色的人物，得到這些成績，也就足以自滿的了。在一八二三年，他指示出歷來認為不能凝結的氯氣，可以用適當的方法，使之化為液體。他用一個密封着的玻璃管，內盛氯與水的固體化合物，用火加熱，即見管中他一端有油狀的液體分離出來。據說恰巧當時有巴黎博士（Dr. Paris）在實驗室內，看見這種油狀物，還譏笑這位青年化學家，說他太不注意，怎麼會使用不潔淨的器具。次日他就接着法拉第的信，其文如下：「你昨天看見過的油狀物，結果乃是液態的氯」。因為在管內從固態化合物分離出來的氯氣，發生很大的壓力，足以使牠自身液化。法拉第由此線索，遂將其他種種永久氣體，都化為液態。因此指出舊日對於氣（Gas）和汽（Vapor）所劃定的界限，完全是出於人造，所謂永久氣體不過是沸點甚低的液體的汽罷了。這一個發見，使關於液態及氣態間的關係的觀念，得到很正當的立足點，同時掃去一切障礙，俾真正的物質動力說得以出現。因為發生的氣壓極高，而使用的容器又太脆，所以這些實驗，不能免於危險，其中有一次，有十三塊以上的玻璃碎

片，炸進了這位哲學家的眼內，還算幸事未曾使他的視力受到永遠的傷害。

還有一篇論文，題目到很客氣，叫做「一種新的碳氫化合物 (a. new compound of carbon and hydrogen)」，內容是發表苯 (benzol) 的發見，這是一種最重要的化學物質，就到現在也還爲人類所利用，不僅作成燃料，作成清洗劑，作成商業上種種溶媒，異常重要，並且還成爲苯胺染料工業 (aniline dye industry) 的基礎。

* * *
現在已進入法拉第的發見的極盛時代了。長久的學習期間已滿，在許多並非不重要的方面（此時已有六十餘篇創作論文），已證明了他的熟練，做一個科學家，或許照他自己的意思，做一個哲學家，已經有了很充分的準備，正要開始進入本題，這個題目是和他的名字永遠聯在一起不會分開的。在未會敘述這個新階級之前，讓我們先認識他到達這個時期以前的私人生活。

* * *
他在一八二一年和塞拉伯納 (Sarah Barnard) 小姐結婚，她是法拉第常常去的那個禮

拜堂的牧師的女兒。這個婚姻是很美滿的。法拉第對於他的夫人具有很深切很豪爽的爱情，並且是與年俱增，和她在一起，永遠覺到快樂與安適。法拉第夫人是滿腔柔情關懷着她的丈夫，只要看到他的研究工作緊張過度，爲他的體力所難勝任的時候，就應用她的愛情權威，使他離開實驗室。他們沒有生育，卻有許多姪兒姪女，常常總有一個，到他們那裏去住，只要一有地位空出，立刻就有另一人來補上。法拉第的餘暇本已無多，大都用來指導他們或和他們取樂。因爲他很喜歡小朋友，所以他深知小朋友們的舉動和需要，並能引起他們的響應。就是那煩難的加法，只要由他去解釋，也會變成有趣。小朋友坐在他的實驗室裏看他工作，常常都覺好玩。他一面做着重要的工作，一面要時時停下來將一小塊鉀拋到水裏面去，或者做些其他的化學把戲，去逗小朋友。這些小小的實驗，在任何雜誌中都未曾記載過，或許在別的書上登載過也難說。法拉第夫人在他丈夫死後還活着。想到和她離別，縱令爲期很暫，也要算得法拉第對於死的幻想中唯一無二的暗黑陰影了。

一八二二年法拉第正式加入了桑提曼教派 (Sandemanian Church)，他的父母也屬於這一派。這一派差不多無人知道的非國教團體，是長老會 (Presbyterian Church) 的一個支

派，在數百年前就已成立的。雖然他們很簡朴很幼稚，可是有些事情，卻反而走到時代的前面。他們認為教會要依仗國家的力量，未免有損基督的尊嚴，除非變成當初建立時所反對的而外，決不能成爲國教。他們相信基督降世，並非爲着俗世的繁榮，來建立地上的王國，乃是爲着要賜與信仰他的人一種確切的希望，使他們知道除卻坟墓而外，還有永久的生命。他們相信上帝對於信仰者有人事上的權力，他們之所以得救，就由這種信仰，不但如此，就是使他們知道懺悔，去投到上帝的腳下，也都是上帝的恩惠，不是他們自己的能力弄得到的，也不是應當得的。

法拉第爲信仰而加入這個教派，不久就成爲派中的長老，遇有機會卽向他們說教，絕對不用誘惑的口氣（雖然誰也不及他會利用這樣的口氣），言辭總是很有敬意，很謙遜的。使他成爲當代第一流講演家的那種技術和態度，還有使他超絕流俗的那些睿智和成就，全都一律拋卻，去崇拜上帝，因爲在上帝面前，無所謂智愚，無所謂文明野蠻，亦無所謂自由與不自由。法拉第的宗教觀念，實其爲人之中思想，使其生涯充滿了能力和和平，在其一切行動中，均表現出來。有人問到，雖能立即說出，但卻不會勉強別人談論宗教，就在社交寒暄中，也從不提及，僅對於他人所欲知者，與以

答覆而已。

他的科學談論中，並不見有這種深摯的宗教信仰混入，這是因為他覺得宗教的領域，更遠超出科學領域之上，單由人類的智力，是無法達到的。他說：『我相信未來的真理，決不能由人類的心力，可以知道的，心力再發達，也是徒然；必須求之於人類自身的教訓以外，只有從聖經中的信仰，纔接受得到。』

同時他認爲上帝的事物，雖有許多是俗人看不見的，但若從成功的事物去推想，就會明瞭。他從上帝在自然界中所用的方法，得到暗示，知道上帝在精神界中的目的，並且很隨便的就利用來供他本身和他的友人的需要。他寄給一個失意中的友人的信上，寫着：『我近來有許多天的夜間，都在眺望山上的雲，其聚也非我所預料；其散也適當我認爲尙應陰霾之時；其降而爲雨也，雖與我個人以不便，周圍固莫不蒙其惠；其開也頓呈美景，又當我預計應在黑暗中散步之時。總之，外貌無論如何確定，只要我一加推測，必會發見自己的錯誤。我所得到的唯一的結論，就是其目的之美滿，固不下於其方式之優美也。』

「人生也是這樣；我雖然對於不幸，裝做不甚關懷，其實我見得很多，在我們平常認為是煩惱，不過是個人的私見罷了，也有轉禍為福的。要點是這樣：在一切的知識中，我卻發見了我自己的觀察不足，判斷不正。我由實驗得到的結論，有一部分是對的，但尚有一部分錯誤也是的確的。我若果能够用別的實驗來糾正，那我就進了一步，舊的錯誤也減少了一些，但仍不免帶着人類的色彩，可由其永不會完全的一點，為之證明。對於別人的動機，加以判斷，情形亦同。碰巧我可以看出不少的地方，但決不會全部都看得出。人生事件，又何獨不然。我對於遠地事物的見解，和對於近在身邊的事物的見解，從不相應。我希望要打開難局的辦法，決不是實際出現於我眼前的方法。在這些例中，在一切的知識和經驗中，仍究相同，對於我們永久是不完全的，結果總是美滿的。一切的事件都永遠在源源不絕施惠於我們的權力統治之下。既是如此，為何我們遇着不得意的時候，不將沉鬱的精神和思想，暫行攔下，只要能够抵抗摧殘我們的風雨，就可懸想行將被牠們帶來的美滿結果，引以自慰呢？」

一八二三年法拉第當選爲皇家學院的會員。當時的院長德斐因法拉第會做過他個人的助手，所以對於他的當選，頗爲反對，殊屬憾事。好在選出來以後，德斐既然失敗，法拉第的心胸又很寬闊，不會懷恨，因此兩人間的友情，也不至於永久決裂。翌年法拉第在研究院內開始演講，一八二五年他在當初僅以微末助手進身的那個實驗室中，充當起指導員來了。法拉第的精力方法以及對於這個位置的創造力，使研究院脫離財政困難，是不成問題的了。他因爲要傾注全力於其工作，所以辭退了當時正在創設的倫敦大學的教授職務。一年後研究院的主持人「因爲他正在從事研究」，纔免去了他那講演助手的職務。一八二八年在研究院管理會中取得一席地位。——見法拉第傳

附記

法拉第 (Michael Faraday 一七九一——一八六七) 是十九世紀英國一位名化學家、物理學家。生於倫敦附近一個鐵匠的家裏，少年時代對科學書籍甚感興趣。科學巨子德斐 (Sir Humphry Davy) 很賞識他，引薦他在皇家學院做自己的助手，不久又攜帶他游歷歐洲大陸。一八二七年法拉第繼德斐之後爲皇家學院的化學教授，此後於化學、電學多有發明，對近代科學貢獻甚大。

法拉第傳作者克勞斯 (J. A. Crowther) 的生平不詳。

——編者

朱執信先生傳畧

汪精衛

一 人格

我想，敘述執信的生平，實爲十分困難，因爲執信的生平，不是三兩句言語可以說得出的，也不是三兩篇文章可以寫得盡的，將來要由一班後死的朋友，將他生前的著述，搜輯起來，再將所見所聞他生前的事實，纂集起來，方纔可以得他些髣髴。斷不是今日潦潦草草，可以敘述的，我如今只得單將他的人格，略略的敘述一回。

執信的人格，形容起來，惟有中庸的至誠無息四字，可以得其大略：他的刻苦，他的勤力，他的猛向前進的精神，他的一絲不苟的操作，都是他所以能對於革命事業，百折而不回，日進不已的泉源。我以爲他的人格，不但是中國革命黨人的模範，並且是一切求進步的人類的模範。

執信雖然是我的外甥，論年紀卻同我是兄弟一樣，自幼至長，做學問在一處，盡力於革命也在一處，似乎我可以認識執信的人格了。只是我的學問和魄力，較於執信，實在是望塵不及，以我來論，執信實在有「捫燭爲日」的憂恐，我只好就我所知的，備各位的參攷便了。

我以爲執信所以能造成他這樣的人格，有些是由於天資，有些是由於學力的，有些是由於遺傳的，有些是由於修養的。

執信的父親是棟垞先生，棟垞先生是先叔父穀庵先生的門人，他的學問是由穀庵先生傳來的，他一生行事，也是以穀庵先生爲法，卻是他另有一種性情，他的性情，我不敢隨便描寫，我只記得他曾刻有一個圖章，是「隘與不恭」，這「隘與不恭」四字，真可以形容出他自己來了。至於要知道他的深切，是要看棟垞集，不是今日所能詳敘的，執信生在這種家庭，自然會受了多少影響，我以爲執信一生的學問和志節，有多少是從這裏培養出來的。

執信十幾歲以前，只有和學問接觸，沒有和人事接觸，他的天資，聰明絕倫的；加以他的精勤，自然漸漸到了深博的地位，卻是他不止沉潛，而且渾樸，他的進步，不但別人看不出來，連他自己也

似乎不知道的。我記得他一兩件軼事：有一次家兄辛伯先生命我和他及舍姪彥平三個人檢點家中的藏書，約莫檢了二十多日，在這二十多日裏頭，無一日不使我驚訝，因為我隨便舉一部僻書和幾條疑義，他沒有一次不是原原本本說出來的，我和他平日算是一處讀書，我竟做夢也不知道他是這樣的淵博。又有一次，先兄仲器先生教我和他兩個人學算，那教法是十分迅疾的，沒兩個月，從加減乘除至微積分，統通教完，我以為從此我兩個不過略略知些算學的梗概便了。誰知執信自此以後，也沒有專門研究算學，也沒有再受業於算學名師，他自己卻已做成了能應用的算學。

這兩件軼事，還是在他專心學問的時代，到了後來留學日本，研究法學哲學，和練習日本言語文字，也可以歸入專心學問時代裏頭，卻是癸丑以後，他一面亡命，一面盡力推翻帝制，恢復共和，一面還去研究英文，到了最近的兩三年，已能譯英文的書籍了。去年又研究俄文，不多幾月，已能將俄文和人通信。

我如今敘述執信的人格，第一件浮於我的心頭的，就是他一生勤學；他的難能，不在學生時候，而在亡命做事的時候。在那時候，有些人或不免失意頹唐的，或不免輕世肆意的，或者到了無聊的

時候，尋些消遣，或者在那忙亂的時候，不能分心；他卻能在繁忙冗雜時間裏頭，尋出冷靜鑽研的機會來，去探求學問，他的智識和他的道德，所以能日新不已，全在乎此。

執信的家世是寒素的，棟垞先生去世的時候，只剩得幾張琴和幾千卷圖書法帖。執信那時候，還祇得十幾歲，他的弟妹，更是幼弱，教養兩事，家兄辛伯先生便都放在肩上了。我記得辛伯先生輓棟垞先生的聯語：「志屈僂經綸，徒留著述文章，夫豈素心所願？情深若兄弟，屬爲撫存孤弱，敢忘在耳之言？」只是辛伯先生也是一個寒士，那辛勤便也可想而知。前年有一次執信已決心做那萬死不顧一生之事，有幾首詩，中有一首是懷辛伯先生的。內有兩句是：「飲食與教誨，有逾父母恩。」又有兩句是：「長疑成永訣，負負竟何言！」執信自幼看慣他父親廉介的節操，又感受了他母舅「拮据」「搯茶」的無限恩意，再加上了一生的志願和修養，故此他那一種澹泊儉素的操守，竟是純乎自然，毫無勉強的。民國元年之間，執信在廣州，算是不用亡命了；到了二年，漢民先生交卸都督的時候，和執信幾個人，照例的受悠悠之口一番污蔑，到了後來，方纔知道他們還是一身窮骨頭。棟垞先生所留下的琴書，經兩三次亡命之後，也幾乎散失盡了。飲食起居，都是今日顧不了明日，到

如今死了之後，除了寡婦孤兒，沒得一些留遺。

我如今敘述執信的人格，第二件浮於我的心頭的，就是他一生儉樸，柯伯堅所著「麵包略取」的裏頭，有一段大意說是：革命激動的時候，人人是以儉樸相尚，纔能提著潔白無瑕的精神，去從事那純粹的目的，和高尚的事業；把一切利己主義的種種，都掃除乾淨。故此儉樸兩字，實是革命黨人生涯之必要條件，他能否修養精神，能否保持節操，全視此而定。執信一生堅剛不屈的氣節，便都由他儉樸得來的。

我方纔說過棣垞先生是有些隘與不恭的神氣，執信自幼，便也有些這樣。遺傳兩字，在生物學上成爲一個重大的問題，我縱然不敢隨便說；那自幼習染，卻是毫無疑義的了。執信這十年以來，不恭兩字雖是除掉了不少；那隘字卻越是分明，凡是與執信相習的人，沒有一個不知道他疾惡之嚴的。他那疾惡，可分兩種：一是對於朋友，一是他所認爲小人的，他平時對於朋友十分忠厚，也十分篤信，卻是遇着他不以爲然的時候，他全不知道什麼叫做關係，什麼叫做情面，什麼叫做假借，什麼叫做原諒；他是一絲也不放鬆，一毫不將就的。就是予那朋友以難堪，也在所不顧了。至於他平時對

於他所認爲小人的，那一種凜乎不可近的神氣，使人自然辟易，不敢含混過去，也不敢僥倖些什麼，他的朋友受了他的責備和期望，只有越相愛重，他認爲小人的，卻也因為他無瑕者可以摘人，沒奈何。

我如今敘述執信的人格，第三件浮於我心頭的，就是他一生疾惡如仇，須知要是疾惡如仇，方能除惡務盡。第一用省察刻厲的工夫，除去自己的惡；第二用鑑空衡平的工夫，除去朋友的惡，第三用堅壁清野的工夫，除去世間所有惡人。執信平日最恨的，是貌爲忠厚，姑息養奸，貪圖自己得些名聲，少些怨毒，對於是非善惡，一味含糊的過去，縱容得一般惡人，到處橫行，及至後來，自己也坑在裏頭。唉，如今中國已是小人無忌憚的世界了，安得多幾個硬骨頭鐵面皮的人，去摧陷廓清他一下呢！

執信生平，對於革命，只知堅忍，只知猛進，不知道什麼叫做失敗，什麼叫做灰心喪氣，他所已成就的，元年以前之創造民國，元年以後之維護民國，那大略事蹟，已是人人知道的。最近他的計畫和他的希望，限於他的年命，將死之時，徒留著滿襟的淚，我也不忍多說，然即他這一死，於光復廣東，已

是很有價值的，他總算是「以仁爲己任」「死而後已」的了。

我如今不能就他一生的事蹟，樣樣敘述，只能將他的人格，略略敘述一番，須知天資和遺傳，或是不可學而至的。學力和修養，卻是人人可學而至的。執信常常說道：「與其紀念死者，不如責備自己，爲什麼不能和死者一樣？」那麼死者便不死了。

二 學問思想和文字

執信的學問思想和文字之變遷進化，約可分爲四期：

第一期是家學時代。執信的家庭環境，我於敘述執信的人格，曾經說過，執信生在這種家庭環境中，從幼已不肯受那八股試帖的束縛，他抱着藏書，闡然自修，博覽精思，都極其力之所能至，那時候學問思想和文字，都跟着他的尊人棣垞先生一條路走的，只是他那時候所有著述，都沒有留存，他自己也不要留存。

第二期是留學日本時代。家學時代的執信，雖然銳意的繼承先業，只是時代的關係，不容他

不去探尋世界學問，既然探尋世界學問，自然不以譯本爲滿足了。故執信弱冠以後，便去留學日本，他所學的法律政治，尤其注重的是經濟，他的學問慾是極發達的，故此又分出餘力，去學英文，學算術，並博覽各種書籍。那時候他的態度，真真是饑者甘食，渴者甘飲一般，學問思想生了許多的變化，文體也生了許多的變化了。不但這樣，他的一生志節，也定於此時；大抵我們的民族思想，在中國歷史和文學裏頭，是容易得到的，只善於被什麼君臣之義束縛遏抑住了。一旦研究法學，明白了國家和人民之意義，從前的束縛遏抑，便自然擺脫得一些不留，便自然無疑無貳的向着革命做去，這是我們都是如此的，不止執信一人，不過執信在我們裏頭，是一個最堅決勇猛的人便了。執信在那時候，所有著述，也沒有留存，所留存的，只是民報的幾篇文章。

第三期是實行革命時代。執信在日本留學畢業以後，便回國從事於革命運動，十幾年之間，他所做的事業，和中華民國有甚深的關係，在他一生的歷史上，是極重要的。在那時候，他的學問思想和文字，也有非常的進步。這進步的原因：（一）是他十幾年之間，用不斷的努力，將他幼時所得的學問，和留學時所得的學問，日日增益。（二）是他十幾年之間，經歷了種種事變，養成了一種智

深勇沈的品節；這品節影響於他的文學，更添了種種的特色。在那時候，執信寄給朋友的信和所做的詩，都是有可傳的價值的。可惜執信沒有留稿，他的朋友也是東西南北無定的，縱然有心去保存，總不免歸於散失，如今搜集起來，真真是寥寥無幾。這真真是可痛的事了，如今所留存的，只有民國雜誌的文字。

第四期是最近的三四年 漢民嘗說：『執信沒有什麼遺憾，所遺憾的就是沒有尼采和馬克的壽數。』這話是深知執信，深痛執信，方纔說得出，執信臨死的三四年，學問思想的進步，實令人瞿然失驚。他除了日本文英文繼續研究之外，又去研究俄文，他不止抱着一腔政治革命的熱誠，他還又抱着一腔改造社會的熱誠；他漸漸的改變了從前的文體，將白話文來做宣傳的利器，他的詩體也改變了，他的著述，登在上海晨報、上海星期評論和建設雜誌上，比較在民報、民國雜誌，都多了許多，然而他的懷抱未盡什一，他的將來希望，方纔發軔，我除了同情於漢民所說之外，沒有可說的了。

我以上祇將執信的學問思想和文字之變遷進化，略略的分期敘述，以便讀者知道他的過程，

至他的著述，和中華民國是怎樣的關係？和社會是怎樣的關係？他的著作和他的人格，又是怎樣的關係？都讓讀者虛心領會，不用我多說了。

丁在君這個人

胡適

傅孟真先生的「我所認識的丁文江先生」是一篇很偉大的文章，只有在君當得起這樣一篇好文章。孟真說：

我以為在君確是新時代最良善最有用的中國人之代表；他是歐化中國過程中產生的最高的菁華；他是用科學知識作燃料的大馬力機器；他是抹殺主觀，為學術為社會為國家服務者，為公衆之進步及幸福而服務者。

這都是最確切的評論。這裏只有「抹殺主觀」四個字也許要引起他的朋友的誤會。在君是主觀很強的人，不過孟真的意思似乎只是說他「抹殺私意」，「抹殺個人的利害。」意志堅強的人都不能沒有主觀，但主觀是和私意私利絕不相同的。王文伯先生曾送在君一個綽號，叫做 the *conclusionist*，可譯做「一個結論家。」這就是說，在君遇事總有他的「結論」並且往往不放鬆他的

「結論。」一個人對於一件事的「結論」多少總帶點主觀的成分，意志力強的人帶的主觀成分也往往比較一般人要多些。這全靠理智的訓練深淺來調劑。在君的主觀見解是很強的，不過他受的科學訓練較深，所以他在立身行道的大關節上終不愧是一個科學時代的最高產兒，而他的意志的堅強又使他忠於自己的信念，知了就不放鬆，就決心去行，所以成爲一個最有動力的現代領袖。

在君從小不喜歡吃海味，所以他一生不吃魚翅、鮑魚、海參。我常笑問他：這有什麼科學的根據？他說不出來，但他終不破戒。但是他有一次在貴州內地旅行，到了一處地方，他和他的跟人都病倒了。本地沒有西醫，在君是絕對不信中醫的，所以他無論如何不肯請中醫診治，他打電報到貴陽去請西醫，必須等貴陽的醫生趕到了他纔肯喫藥。醫生還沒有趕到，他的跟人已病死了，人都勸在君先服中藥，他終不肯破戒。我知道他終身不曾請教過中醫，正如他終身不肯拿政府乾薪，終身不肯因私事旅行借用免票坐火車一樣的堅決。

我常說，在君是一個歐化最深的中國人，是一個科學化最深的中國人。在這一點根本上，

眼中人物真沒有一個人能比上他。這也許是因爲他十五歲就出洋，很早就受了英國人生活習慣的影響的緣故。他的生活最有規則：睡眠必須八小時，起居飲食最講究衛生，在外面飯館裏吃飯必須用開水洗杯筷；他不喝酒，常用酒來洗筷子；夏天家中吃無外皮的水果，必須先在滾水裏浸二十分鐘。他最恨奢侈，但他最注重生活的舒適和休息的重要：差不多每年總要尋一個歇夏的地方，很費事的布置他全家去避暑；這是大半爲他的多病的夫人安排的，但自己也必須去住一個月以上；他的弟弟、姪兒、內姪女，都往往同去，有時還邀朋友去同住。他絕對服從醫生的勸告：他早年有腳癢病，醫生說赤腳最有效，他就終身穿有多孔的皮鞋，在家常赤腳，在熟朋友家中也常脫襪子，光着腳談天，所以他自稱「赤腳大仙」。他吸雪茄煙有二十年了，前年他腳指有點發麻，醫生勸他戒煙，他立刻就戒絕了。這種生活習慣都是科學化的習慣；別人偶一爲之，不久就感覺不方便，或怕人譏笑，就拋棄了。在君終身奉行，從不顧社會的駭怪。

他的立身行己，也都是科學化的，代表歐化的最高層。他最恨人說謊，最恨人懶惰，最恨人濫舉債，最恨貪污。他所謂「貪污」包括拿乾薪，用私人濫發薦書，用公家免票來做私家旅行，用公家信

箋來寫私信，等等。他接受滬滬總辦之職時，我正和他同住在上海客利飯店，我看見他每天接到不少的薦書。他叫一個書記把這些薦信都分類歸檔，他就職後，需要用某項人時，寫信通知有薦信的人定期來受考試，考試及格了，他都僱用；不及格的，也一一通知他們的原薦人。他寫信最勤，常怪我案上堆積無數未覆的信。他說：「我平均寫一封信費三分鐘，字是潦草的，但朋友接着我的回信了。你寫信起碼要半點鐘，結果是沒有工夫寫信！」蔡子民先生說在君「案無留牘」這也是他的歐化的精神。

羅文幹先生常笑在君看錢太重，有寒儉氣。其實這正是他的小心謹慎之處。他用錢從來不敢超過他的收入，所以能終身不欠債，所以能終身不仰面求人，所以能終身保持一個獨立的清白之身。他有時和朋友打牌，總把輸贏看得很重，他手裏有好牌時，手心常出汗，我們常取笑他，說摸他的手心可以知道他的牌。羅文幹先生是富家子弟出身，所以更笑他寒儉。及今思之，在君自從留學回來，擔負一個大家庭的求學經費，有時候每年擔負到三千元之多，超過他的收入的一半，但他從無怨言，也從不欠債；寧可拋棄他的學術生活去替人辦煤礦，他不肯用一個不正當的錢；這正是他的

嚴格的科學化的生活規律不可及之處；我們嘲笑他，其實是我們窮書生而有闊少爺的脾氣，真不配批評他。

在君的私生活和他的政治生活是一致的。他的私生活的小心謹慎就是他的政治生活的預備。民國十一年，他在「努力週報」第七期上（署名「宗淹」）曾說，我們若想將來做政治生活，應做這幾種預備。

第一、是要保存我們「好人」的資格。消極的講，就是不要「作爲無益」；積極的講，是躬行克己，把責備人家的事從我們自己做起。

第二、是要做有職業的人，並且增加我們職業上的能力。

第三、是設法使得我們的生活程度不要增高。

第四、就我們認識的朋友，結合四五個人，八九個人的小團體，試做政治生活的具體預備。

看前面的三條，就可以知道在君處處把私生活看作政治生活的修養。民國十一年他和我們幾個人組織「努力」我們的社員有兩個標準：一是要有操守，二是要在自己的職業上站得住。他最恨那

些靠政治吃飯的政客。他當時有一句名言：「我們是救火的，不是趁火打劫的。」（努力第六期）他做淞滬總辦時，一面整頓稅收，一面採用最新式的簿記會計制度。他是第一個中國大官卸職時半天辦完交代的手續的。

在君的個人生活和家庭生活，孟真說他「真是一位理學大儒。」在君如果死而有知，他讀了這句贊語定要大生氣的！他幼年時代也曾讀過宋明理學書，但他早年出洋以後，最得力的是達爾文、林肯黎一流科學家的實事求是的精神訓練。他自己曾說：

科學……是教育同修養最好的工具。因為天天求真理，時時想破除成見，不但使學科學的人有求真理的能力，而且有愛真理的誠心。無論遇見甚麼事，都能平心靜氣去分析研究，從複雜中求單簡，從紊亂中求秩序；拿倫理來訓練他的意思，而想象力愈增；用經驗來指示他的直覺，而直覺力愈活。了然於宇宙生物心理種種的關係，纔能够真知道生活的樂趣。這種活潑潑地心境，只有拿望遠鏡仰察過天空的虛漠，用顯微鏡俯視過生物的幽微的人，方能參領的透徹，又豈是枯坐談禪，妄言玄理的人所能夢見？（努力第四十九期）玄學與科學）

這一段很美的文字，最可以代表在君理想中的科學訓練的人生觀。他最不相信中國有所謂「精神文明」，更不佩服張君勱先生說的「自孔孟以至宋元明之理學家側重內生活之修養，其結果爲「精神文明」。民國十二年四月中在君發起「科學與玄學」的論戰，他的動機其實只是要打倒那時候「中外合璧式的玄學」之下的精神文明論。他曾套顧亭林的話來罵當日一班玄學崇拜者：

今之君子，欲速成以名於世，語之以科學，則不願學，語之以柏格森、杜里舒之玄學，則欣然矣，以其襲而取之易也。（同上）

這一場的論戰現在早已被人們忘記了，因爲柏格森、杜里舒的玄學又早已被一批更時髦的新玄學「取而代之」了。然而我們在十三四年後回想那一場論戰的發難者，他終身爲科學僂力，終身奉行他的科學的人生觀，運用理智爲人類求真理，充滿着熱心爲多數人謀福利，最後在尋求知識的工作途中，歌唱着「爲語麻姑橋下水，出山要比在山清」，悠然的死了，——這樣的一個人，不是東方的內心修養的理學所能產生的。

丁在君一生最被人誤會的是他在民國十五年的政治生活。孟眞在他的長文裏，敘述他在滬總辦任內的功績，立論最公平。他那個時期的文電，現在都還保存在一個好朋友的家中，將來作他傳記的人（孟眞和我都有這種野心）必定可以有詳細公道的記載給世人看，我們此時可以不談。我現在要指出的，只是在君的政治興趣。十年前，他常說：「我家裏沒有活過五十歲的，我現在快四十歲了，應該趁早替國家做點事。」這是他的科學迷信，我們常常笑他。其實他對政治是素來有極深的興趣的。他是一個有幹才的人，絕不像我們書生放下了筆桿就無事可辦，所以他很自信。有替國家做事的能力。他在民國十二年有一篇「少數人的責任」的講演（努力第六十七期），最可以表示他對於政治的自信力和負責任的態度。他開篇就說：

我們中國政治的混亂，不是因為國民程度幼稚，不是因為政客官僚腐敗，不是因為武人軍閥專橫；是因爲「少數人」沒有責任心，而且沒有負責任的能力。

他很大膽的說：

丁在君這個人

中年以上的人，不久是要死的；來替代他們的青年，所受的教育，所處的境遇，都是同從前不同的。只要有幾個人，有不折不回的決心，披山蹈海的勇氣，不但有知識而且有能力，不但有道德而且要做事業，風氣一開，精神就要一變。

他又說：

只要有少數裏面的少數，優秀裏面的優秀，不肯束手待斃，天下事不怕沒有辦法的。……最可怕的是一種有知識有道德的人不肯向政治上去努力。

他又告訴我們四條下手的方法，其中第四條最可注意。他說：

要認定了政治是我們唯一的目的，改良政治，是我們唯一的義務。不要再上人家當，說改良政治要從實業教育着手。

這是在君的政治信念。他相信，政治不良，一切實業教育都辦不好。所以他要我們少數人挑起改良政治的擔子來。

然而在君究竟是英國自由教育的產兒，他的科學訓練，使他不能相信一切破壞的革命的方

式。他曾說：

我們是救火的，不是趁火打劫的。

其實他的意思是要說，

我們是來救火的，不是來放火的。

照他的教育訓練看來，用暴力的革命總不免是「放火」，更不免要容納無數「趁火打劫」的人。所以他只能期待「少數裏的少數，優秀裏的優秀」起來擔負改良政治的責任，而不能提倡那放火式的大革命。

然而民國十五六年之間，放火式的革命到底來了，並且風靡了全國。在那個革命大潮流裏，改良主義者的丁在君當然成了罪人了。在那個時代，在君曾對我說：「許子將說曹孟德可以做『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我們這班人恐怕只可以做『治世之能臣，亂世之飯桶』罷！」

這句自嘲的話，也正是在君自贊的話。他畢竟自信是「治世之能臣」。他不是革命的材料，但他所辦的事，無一事不能辦的頂好。他辦一個地質研究班，就可以造出許多奠定地質學的臺柱子；

他辦一個地質調查所，就能在極困難的環境之下，造成一個全世界知名的科學研究中心；他做了不到一年的上海總辦，就能建立起一個大上海市的政治、財政、公共衛生的現代式基礎；他做了一年半的中央研究院的總幹事，就把這個全國最大的科學研究機關重新建立在一個合理而持久的基礎之上。他這二十多年的建設成績，是不愧負他的科學訓練的。

*

*

*

*

在君的爲人，是最可敬愛，最可親愛的。他的奇怪的眼光，他的虬起的德國維廉皇帝式的鬍子，都使小孩子和女人見了害怕。他對於不喜歡的人，總是斜着頭，從眼鏡的上邊看他，眼睛露出白珠多，黑珠少，怪可嫌的！我曾對他說：「從前史書上說阮籍能作青白眼，我向來不懂得；自從認得了你，我纔明白了『白眼對人』是怎樣一回事！」他聽了大笑。其實同他熟了，我們都只覺得他是一個最和藹慈祥的人。他自己沒有兒女，所以他最喜歡小孩子，最愛同小孩子玩，有時候他伏在地上作馬給他們騎。他對朋友最熱心，待朋友如同自己的弟兄兒女一樣。他認得我不久之後，有一次他看見了我喝醉了酒，他十分不放心，不但勸我戒酒，還從「嘗試集」裏挑出了我的幾句戒酒詩，請梁

任公先生寫在扇子上送給我。（可惜這把扇子丟了！）十多年前，我病了兩年，他說我的家庭生活太不舒適，硬逼我們搬家；他自己替我們看定了一所房子，我的夫人嫌每月八十元的房租太貴，那時我不在北京，在君和房主說妥，每月向我的夫人收七十元，他自己代我墊付十元。這樣熱心愛管閑事的朋友，是世間很少見的。他不但這樣待我，他待老輩朋友，如梁任公先生，如葛利普先生，都是這樣親切的愛護，把他們當作他最心愛的小孩子看待！

他對於青年學生，也是這樣的熱心；有過必規勸，有成績則贊不絕口。民國十八年，我回到北平，第一天在一個宴會上遇見在君，他第一句話就說：「你來，你來，我給你介紹趙亞曾！這是我們地質學古生物學新出的一個天才，今年得地質學獎金的！」他那時臉上的高興快樂是使我很感動的。後來趙亞曾先生在雲南被土匪打死了，在君哭了許多次，到處爲他出力徵募撫卹金。他自己擔任亞曾的兒子的教育責任，暑假時帶他同去歐夏，自己督責他補功課；他南遷後，把他也帶到南京轉學，使他可以時常督教他。

在君是個科學家，但他很有文學天才；他寫古文白話文都是很好的。他寫的英文可算是中國

人之中的一把高手，比許多學英國文學的人高明的多多。他也愛讀英法文學書；凡是羅素、威爾士、J.M.Keynes 的新著作，他都全購讀。他早年喜歡寫中國律詩，近年聽了我的勸告，他不作律詩了，有時還作絕句小詩，也都清麗可喜。朱經農先生的紀念文裏有在君得病前一日的衡山紀遊詩四首，其中至少有兩首是很好的。他去年在莫千山做了一首罵竹子的五言詩，被林語堂先生登在「宇宙風」上，是大家知道的。民國二十年，他在秦皇島避暑，有一天去遊北戴河，作了兩首懷我的詩，其中一首去：

峰頭各採山花戴，海上同看明月生，此樂如今七寒暑，問君何日踐新盟。

後來我去秦皇島住了十天，臨別時在君用元微之送白樂天的詩韻作了兩首詩送我：

留君至再君休怪，十日流連別更難。從此聽濤深夜坐，海天漠漠不成歡！

逢君每覺青來眼，顧我而今白到鬚。此別原知旬日事，小兒女態未能無。

這三首詩都可以表現他待朋友的情誼之厚。今年他死後，我重翻我的舊日記，重讀這幾首詩，真有不堪回憶之感，我也用元微之的原韻，寫了這兩首詩紀念他：

明知一死了百願，無奈餘哀欲絕難！高談看月聽濤坐，從此終生無此歡！
愛憎能作青白眼，嫵媚不嫌虬怒鬚，捧出心肝待朋友，如此風流一代無！

這樣一個朋友，這樣一個人，是不會死的。他的工作，他的影響，他的流風遺韻，是永永留在許多後死的
朋友的心裏的。

——見獨立評論

二十五，二，九夜。

高夢旦先生小傳

胡適

民國十年的春末夏初，高夢旦先生從上海到北京來看我。他說，他現在決定辭去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所長的事，他希望我肯去做他的繼任者。他說：「北京大學固然重要，我們總希望你不会看不起商務印書館的事業。我們的意思確是十分誠懇的。」

那時我還不滿三十歲，高先生已是五十多歲的人了。他的談話很誠懇，我很受感動。我對他說：「我決不會看不起商務印書館的工作。一個支配幾千萬兒童的知識思想的機關，當然比北京大學重要多了。我所慮的只是怕我自己幹不了這件事。」當時我答應他夏天到上海商務印書館去住一兩個月，看看裏面的工作，並且看看我自己配不配接受高先生的付託。

那年暑假期中，我在上海住了四十五天，天天到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去，高先生每天他把我編譯所各部分的工作指示給我看，把所中的同事介紹和我談話。每天他家中送飯來，我若沒有外面的

約會，總是和他同吃午飯。

我知道他和館中的前輩張菊生先生、鮑咸昌先生、李拔可先生，對我的意思都很誠懇。但是我研究的結果，我始終承認我的性情和訓練都不配做這件事。我很誠懇的辭謝了高先生。他問我意中有誰可任這事。我推薦王雲五先生，並且介紹他和館中各位老輩相見。我們會見了兩次之後，我就回北京去了。

我走後，高先生就請王雲五先生每天到編譯所去，把所中的工作指示給他看，和他從前指示給我一樣。一個月之後，高先生就辭去了編譯所所長，請王先生繼他的任，他自己退居出版部部長，盡心盡力的襄助王先生做改革的事業。

民國十九年，王雲五先生做了商務印書館的總理。民國二十一年一月，商務印書館的關北各廠都被日本軍隊燒毀了。兵禍稍定，王先生決心要做恢復的工作。高先生和張菊生先生本來都已退休了，當那危急的時期，他們每天都到館中來襄助王先生辦事。兩年之中，王先生苦心硬幹，就做到了恢復商務印書館的奇蹟。

我特別記載這個故事，因為我覺得這是一件美談。王雲五先生是我的教師，又是我的朋友，我推薦他自代，這並不足奇怪。最難能的是高夢旦先生和館中幾位老輩，他們看中了一個少年書生，就要把他們畢生經營的事業付託給他；後來又聽信這個少年人的幾句話，就把這件重要的事業付託給了一個他們平素不相識的人。這是老成人爲一件大事業求付託的人的苦心，是大政治家謀國的風度。這是值得大書深刻，留給世人思念的。

*

*

*

*

高夢旦先生，福建長樂縣人，原名鳳謙，晚年只用他的表字「夢旦」爲名。「夢旦」是在夢夢長夜裏想望晨光的到來，最足以表現他一生追求光明的理想。他早年自號「崇有」，取晉人裴頠崇有論之旨，也最可以表現他一生崇尚實事痛恨清談的精神。

因爲他期望光明，所以他最能欣賞也最能了解這個新鮮的世界。因爲他崇尚實事，所以他不要緊的條件只是人人盡他的一點一滴的責任，貢獻他一分一秒的光明。高夢旦先生晚年發表了

幾件改革的建議，標題引一個朋友的一句話：「都是小問題，並且不難辦到。」這句引語最能寫出他的志趣。他一生做的事，三十年編纂小學教科書，三十年提倡他的十三個月的曆法，三十年提倡簡筆字，提倡電報的改革，提倡度量衡的改革，都是他認為不難做到的小問題。他的賞識我，也是因為我一生只提出一兩個小問題，鏗而不舍的做去，不敢好高務遠，不敢輕談根本改革，够得上做他的一個小同志。

高先生的做人，最慈祥，最熱心，他那古板的外貌裏藏着一顆最仁愛暖熱的心。在他的大家庭裏，他的兒子、女兒都說：「吾父不僅是一個好父親，實兼一個友誼至篤的朋友。」他的姪兒、姪女們都說：「十一叔是聖人。」這個聖人不是聖廟裏陪吃冷豬肉的聖人，是一個處處能體諒人，能了解人，能幫助人，能熱烈的愛人的、新時代的聖人。他愛朋友、愛社會、愛國家、愛世界。他愛真理、崇拜自由、信仰科學。因為他信仰科學，所以他痛恨玄談、痛恨迷信、痛恨中醫。因為他愛國家社會，所以他愛護人才真如同性命一樣。他愛敬張菊生先生，就如同他愛敬他的兩個哥哥一樣。他們愛惜我們一班年輕的朋友，就如同他愛護他自己的兒女一樣。

他的最可愛之處，是因為他最能忘了自己。他沒有利心，沒有名心，沒有勝心。人都說他沖澹，其實他是濃摯熱烈。在他那濃摯熱烈的心裏，他期望一切有力量而又肯努力的人都能成功勝利，別人的成功勝利都使他歡喜安慰，如同他自己的成功勝利一樣。因為濃摯熱烈，所以沖澹的好像沒有自己了。

高先生生於公曆一八七零年一月二十八日，死於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三日，葬在上海虹橋公墓。葬後第四個月，他的朋友胡適在太平洋船上寫這篇小傳。——見東方雜誌

我所認識的高夢旦先生

王雲五

我最初認識高夢旦先生，是在民國十年中秋節之前一二星期。那時候他正擔任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所長；我卻閒居在上海，替一個舊學生新辦的一間小書店主編一部叢書。給我們介紹的人就是胡適之先生。因為高先生擔任商務的編譯所所長多年，自己常以不懂外國文字爲憾；自從新文化運動開始以後，商務努力出版關於新文化的書籍，高先生認爲不懂外國文字的人，對於新文化的介紹，不免有些隔閡；因此，屢屢求賢自代。他看中了新文化運動的大師胡適之先生，盼望他能够俯就商務編譯所所長。經過了多次勸駕，拖延了幾個年頭，胡先生畢竟礙於情面而應允了。但是胡先生的應允是有條件的；他的條件就是先行嘗試幾個月，如果嘗試之後，認爲於自己的性情不合，仍然要還他初服的。那時候胡先生正在北大任教，爲便利嘗試起見，擇定民國十年的暑假，暫時不用名義來商務編譯所視察兩個月。經過相當時期之後，胡先生把商務編譯所的內容和工作都

研究清楚；一面提出改革的計畫，一面卻以編譯所長的職務關於行政方面較多，與他的個性不很相宜，便對高先生說明他的意旨，打算嘗試期滿，仍回北大教書。高先生是極重信義的人，也是最能尊重他人意旨的人，因此，他對於胡先生繼任編譯所所長，雖然害了好幾年的單相思，但是經胡先生堅決表示意旨之後，他便不敢強留，於是不得已而思其次；請求胡先生找一個替身。他因為崇拜胡先生，便以胡先生認為適當的人，沒有不適當的事有湊巧，胡先生從前和我有同學之雅；當他出洋留學以前，我們常在一起。他回國任教於北大的時候，我已經回南方；直至這次來上海小住，我們纔有機會話舊，而且常相過從。他從前知道我對於讀書做事都能吃苦，又會發見我於青年時代做過一件呆事，把一部大英百科全書從頭至尾讀了一遍，這次留滬相聚，又知道我十年來讀書做事的經過，和新近從事編譯事業。那時候不知道他怎樣決定下來，事前絕對沒有和我商量，便把我推薦於高先生，作爲他自己的替身。高先生對於我從前並無一面之雅；對於我的著譯，據他後來對我說，雖略經寓目，卻沒有看出什麼特色。可是一經胡先生的推薦，他便毫不遲疑的鄭重考慮。經胡先生介紹我們一度晤談之後，他便向商務當局提議舉我自代。我呢，因為正想從事編譯工作；如果能

够有一個大規模的出版家給我發展，那是無所用其客氣的。而且我平素有一種特性，對於任何新的工作或是重的責任，祇要與我的興趣相合，往往就大着膽去嘗試的。因此我除了提出和胡先生從前所提的惟一條件，就是給我三個月嘗試再行定奪外，也就一口答應下來。記得從民國十年的中秋日，我便到商務編譯所開始工作。初時我並沒有什麼名義，每日承高先生把編譯所的工作和內容詳細見告，並由高先生隨時把種種問題提出和我商量。這樣的過了三個月，他便要求我正式接任編譯所所長，並應允和從前應允胡先生一般，於我接任編譯所所長之後，他仍留所內，改任出版部部長，隨時助我處理所務。我在這幾個月中，承高先生開誠指導，並承他將來繼續相助，同時我對於這件工作的興趣也很濃厚；因此便正式接受了。從此以後，我便和高先生直接共事六年，到了民國十六年，高先生因為年滿六十，堅執要步張菊生先生的後塵，脫離商務的直接職務。但此後十年之間，無時不以商務和我個人的至友資格，盡力贊助；雖至病篤之日，仍不改其態度。自從我開始認識高先生之日，直至他撒手離開這世界的一秒鐘（因為高先生去世的一秒鐘我正待立病榻之旁），中間約莫十五足年，對公事上我和他商討最多，對私交上我也和他過從最密。他的性情，我是

認識最真之一人；他的美德，我也是知道最多之一人。不過事後追記，不免掛一漏萬。而且在百忙當中，要作詳盡的記述，也有所不能。現在且根據留在我腦中最深刻的印象，給高先生寫寫各方面的真容。

第一，高先生是一個老少年。高先生的性行，斷不是幾個字所能完全表現的。如果祇限於幾個字，恐怕再沒有像這老少年三個字爲近似了。高先生去世時已經是六十八歲，不能不算老；高先生在最近幾年間，身體容貌也無一不呈衰老的樣子；可是他的精神，直至服了大量安眠藥，長眠不醒以前，無時無刻不是少年的。他常常對我說，舊日讀書人要推行所主張的事，往往以「於古有之」一句話爲護符。高先生卻以爲把這個「古」字改作「外」字較爲妥當。他並不是說笑話，而是認定古制對於現代至少是不適合的。他又以爲，現在強盛之外邦確有其致強盛之道；社會狀況縱然彼此有些不同，而自然科學是沒有國界的。推此一念，所以有病待治，則絕對信賴西醫，而反對中醫；甚至對其最崇拜之胡適之先生爲某中醫捧場時，他也不怕公然反對。又如度量衡一項，他極力提倡最合科學的米突制，而反對任何折中的制度，或實際流行頗廣的英美制。這還算關於自然

科學的。至於社會問題，他也很傾向於新的方面。記得民國十年我初到商務任事時，編譯所同事某君，以向未結婚的老童男和再醮的某女士結婚；這在目前本不爲奇，但十五年前的社會習慣，和現在相差遠遠。高先生對於此事，卻嘗做斷髮天足一般的熱心提倡，逢人表示恭維的意思。又高先生平素雖不喜談政治，但偶遇時人主張一種制度而附會到舊說或舊制的時候，高先生屢屢對我說，這簡直像把現代國家之共和制度和周召共和附會起來同樣的可笑。這幾個例子，都可以證明高先生的思想是少年而進步的。再從日常細事觀察一下，像高先生的資望和年齡，不知道他的人或者以爲是道貌岸然的。其實大大相反。他每次到我家來，見着我的小兒女，總是和他們戲弄說笑，口裏常說『我和你比比氣力，打打架，好嗎？』因此我的小兒女都不覺得這是老伯伯，祇認爲他是小朋友之一。他不但對朋友的兒女如此，就是對於自己的兒女，而且是長成的兒女，也持着同一態度。別人家的老父，對於已長成的兒女，大都是莊嚴其貌；可是我常見高先生和他的兒女一起談笑討論，絕對不擺出老父的派頭。他去世後之某一日，他的長女君珊小姐含淚對我說：『別人家祇不過死了一個父親；我們卻不但死了父親，而且死了最可愛的一個朋友。』這的確是沒有半點虛飾的說

話。又高先生臥病醫院時，我逐日前往探問，因格於醫院的禁令，不敢入病室驚動高先生。高先生卻屢向家人詢問何以我沒有來。家人卒以實告。乃堅囑下次來時，邀我入室，並允不多談話。其後，我入病室相見。我的第一句話，就是請他安心靜養，此時遵醫囑不敢多談話。而高先生第一句的答語，就是「你每日來此，卻不進來談談，我已偵探明白，俟我病好出院，和你算帳打架。」言畢，彼此一笑。其少年的性情，雖在病重時仍然流露。不料這位可以互相打架的青少年朋友，等不及出醫院，已沒有再談話的機會了。

第二，高先生是一個性圓而行方的人。這裏性圓二字，雖然是我所杜撰；但上下聯綴起來，其意義自然明瞭。蔣竹莊、莊百俞兩先生爲高先生所撰的傳，都說高先生性剛。但自從我認識高先生以來，至少有六年工夫，每日和他共事，覺得他總沒有發過一次脾氣。換一方面，我自己卻發了好幾次的怪脾氣，全賴高先生把我鎮靜下來。高先生鎮靜我的脾氣，有一種很巧妙的方法。就是當我脾氣正在發作的時候，他大都對我表示十二分的同情，等我脾氣稍息，他往往用幽默的話，引我的情緒離開關係的問題，漸漸把牠淡忘。俟有相當機會，再用幾句警語，使我自己感覺前次發脾氣之無

意義。他這種方法，如果用於教育上，也可以算是一種優良而有效的方法。他是否對別人也用這種方法，我不得而知。但對我卻已用過好幾次。我平素性情傲僻，自從開始服務以來，除教書時能長久維持學生的好感外，其他所任職務，都不能久於其職。自從加入商務書館後，接連十五年間，雖然好幾次自己想走，但是除了民國十九年一度辭職，那時高先生已經脫離商務書館的直接職務，而且我這次辭職已得高先生同意外，其他好幾次想走的機會，都給高先生用上。上述方法於無形中消泯了。我又常常聽見高先生說起，他替商務做了不少次的和事老。商務的當局，我敢說，都是爲公的；可是學識眼光種種不同，長久共事，總不免有些意見。而介於其間，以妥協的方法消除當局間彼此相左的意見的，恐怕高先生就是最重要之一人。他曾經和我提起一句笑話，說他好像是印刷機器上的橡皮，其意便指此事。而且高先生不只是那時候各當局間的橡皮，並且一度做過商務書館勞資雙方的橡皮。因爲在民國十五年以前，商務勞資雙方雖然極少爭執，卻也曾有過一次局部的罷工；而復工的時候，則由高先生帶領那些罷工者入廠。這件事發生在我加入商務以前，詳情我不知道。事後偶聞高先生說起，當時雖沒有詳詢來由，但總可斷定是靠高先生以平素消泯公司當局間意

見的同一方法，來解決那一次勞資糾紛罷。綜此幾個例子，我爲他杜撰性圓這一名詞，似乎是再適當沒有了。但是他的性情雖是圓的，而他的行爲卻彷彿是四個九十度直角所成的正方形。關於這一項，可舉的例子極多，不及枚舉。概括說起來，就是絕對不要一個不勞而獲的錢，絕對不引用私人，以及違反自己宗旨的事，無論如何絕對不肯屈從。這最後的一項，似乎和性圓的人是不相合的。可是就我十幾年來所知道的，高先生一方面很方正的維持他的宗旨，另一方面仍無損於圓通的性情。這確是別人所做不到；尤其是像我這樣的人，是斷斷不能學步的。

第三，高先生是一個思慮周密而非寡斷的人。高先生思慮的周密，凡在知好同事沒有不承認的。即高先生自己也不否認。但是寡斷一語，卻是他自己的謙辭。別人因爲受了這種自我宣傳的影響，卻也有些承認此語的。其實思慮周密的人，因爲顧慮過多，遇事間或不易決斷。不過思慮周密的程度如果達到相當的高，把利害分析得很清楚，雖然任何辦法不能有絕對的利，儘可採取利最多而害最少之法；因此仍不難下決斷。高先生實是這一種的人，所以他的思慮儘管周密，遇事仍能下最大決心。試舉一極顯著的例子，當他舉我自代之時，我的聲名遠不及胡適之先生，我和高先生

的交情可說是絕對無有；同時懷疑我的人，在商務內外皆有之。事後他都告訴我，我自己也承認這種種懷疑亦有相當理由。但是高先生一部分固然是信賴胡適之先生的推薦，大部分還是利用他周密的思慮，把利害兩方細細權量輕重，才毅然下此決斷的。

第四，高先生是一個不能演說的說客。高先生常常稱讚我的演說才，而自恨不能演說的確，我和高先生認識了十五年，沒有聽過他一次的演說。所以高先生關於這一項的謙辭，我不敢否認。可是高先生當說客的本領，是值得人人讚許的。我親見他爲着商務書館的事，做過了好幾次的說客，每次都有滿意的結果。對公衆的演說和對私人的說辭，方法本不相同；公衆的演說第一要有氣魄，第二要言語清楚，第三還要帶點荒唐的態度。高先生說話不很響亮，所說的國語帶了一半福建土白；同時過分謹慎，恐怕在公衆面前演說，要出了什麼差處。因此他不肯輕易作演說的嘗試。久而久之，便更覺自怯，而認爲自己的確不能演說。其實，祇要一二次大着膽嘗試嘗試，便不覺其難了。我屢次以此勸誘高先生，甚至有一回爲着他所最熱心提倡的四角號碼檢字法研究班舉行競賽給獎，堅請他作簡單的演說。他總沒有答應。可是高先生的口才原來不差；一則他有邏輯的思想，二則

他很熟識世故，三則他有極誠懇的態度，四則他有極圓通的性情，所以什麼複雜的事，經他解釋或疏通一下，沒有不癥結立解的。

第五，高先生是一個不長於算學的算學家。我國舊日的讀書人，最不注重數目字；所以說到山的高，動輒千百里，說到田的多，動輒萬千頃，做起事來，也就不肯一一二二分別清楚，總是「差不多」，「大概」這樣的模糊過去。甚至受過新式教育的人，表面上高等算學也會涉獵；但是除有直接運用算式的必要外，平時辦事也很少利用算學來解決的。高先生卻不如此，他雖然是舊學的出身，沒有受過新教育的洗禮，他對於算學的智識也不高深；但是討論事件的時候，他總是手持鉛筆，運用四則比例或百分的筆算，作為決斷的根據。在沒有計算清楚以前，不肯遽作結論。他並且喜歡比較計算，譬如想出版某一種書，估計其營業的損失，常人祇不過按照所擬的版式字體或紙張加以計算罷了。高先生卻另行假定種種可能的版式字體和紙張，把這種種假定計算所得的結果和原擬計算的結果互相比較。這雖然多費一些工夫，但他總是不憚煩勞的。他又常常試作統計，雖然他對於統計工作所能運用的算式，祇是百分法或是加法和除法所得的平均數。但是主持全局的

人本來用不着自己從事精深繁瑣的計算，祇要遇事都作粗略的統計或比較，那就很難能可貴了。高先生有了這種運用算學的良好習慣，所以在他的細密思想中，又加上客觀的論據了。

第六，高先生是一個舍短取長的鑑衡家。高先生是最愛才的人，隨時隨地都想物色人材。他對於人材的鑑衡，保持着最公允的態度。他認為天下沒有完全的人物，因此，對於大醇小疵的人材，不僅舍短取長，而且完全忘卻其短處。單就商務書館一方面而論，經他拔擢的人着實不少，結果，都是很有用的人材，影響於商務書館的發展很大。當他舉我自代時，我所有的短處，斷不能逃過他的鑑衡。不過還是保持着平素所持的態度，把我的短處忘卻罷了。

第七，高先生是多方面的研究家，又是許多研究家的贊助人。高先生對於研究的興趣很濃，而且是多方面的。在二十幾年前，有改革部首的草案，其方法但管字形，不管字義，將舊字典的二百十四部，就形式相近者併為八十部，並確定上下左右的部居。此法較舊法已很便利；但高先生是一位徹底的改革家，自己認此方案還不算徹底，始終沒有把他發表。他又抱成功不必在我的態度，當他把自己的檢字方案擱置時，便留心到外間有沒有熱心研究改革檢字方案的人。後來給他發見

林語堂先生曾經發表一種首筆檢字法。那時候林先生在清華大學擔任教科。民國十三年秋間，高先生因事到北平，轉輾託人介紹與林先生詳談，力勸林先生繼續研究。後來回到上海和我商量，我也贊成此舉。因此便由商務編譯所與林先生訂一合作研究的契約。於一年期內，由商務按月資助林先生若干元，由林先生酌減教書的鐘點，從事新檢字法的研究。後來我對於檢字法的研究也發生了興趣，有一天對高先生說起這事，他雖極力贊助他人從事這項研究，但因我日間職務很忙，不願我過於勞苦；便把成功不必在我一語來相勸。但是我的興趣已是一發而不可收拾，便瞞着了高先生，私底下每晚在家裏研究。過了約莫半年，我偶然發明號碼檢字法，歡喜到了不得。次日對高先生和盤托出；他也歡喜萬狀。其後，我因為這號碼檢字法雖然易學，但對於筆畫較多的字還覺不易檢查。於是決計放棄此法，另行研究。又費了一年工夫，才發明四角號碼檢字法。在這時期和以後繼續研究修訂四角檢字法的一二年內，高先生無時不贊助我，並且給我許多有益的意見。及至四角檢字法研究告一段落，高先生又認為一種新方法的成敗固由於本體的效用，但是宣傳工作也有重大關係。於是他便把宣傳四角檢字法引為己任。近年我因為職務特忙，簡直沒工夫顧到檢字法。

高先生卻繼續不斷把這檢字法熱心推行。他常常埋怨我近年對四角檢字法太不熱心，笑對我說：「姓王的所養的兒子四角檢字法，已經過繼給姓高的了。」就此一點，可見高先生對於研究事業的熱心贊助，除了檢字法以外，高先生自己研究而有成績者，有一種十三月的新曆法，已經著有專書，由商務書館出版。高先生因幼時讀沈括的夢溪筆談，大為感動。沈氏倡議更改曆法，分每年為十二月，每月以三十一日與三十日相間，不置閏月，每年每月的日期自較整齊。高先生以沈氏此法較現在陰陽曆為勝。後來又以世界各國既已注重星期，則沈氏之法，尚有修改餘地。修改的要點，在如何聯合年月星期三者，使其成爲一種調和的曆法。經過許久的思考，高先生遂於民國十一年創議分每年爲十三月，每月爲二十八日。此方案先後由新民叢報及東方雜誌發表，引起許多人的注意。及民國十六年全國教育會議開會，高先生將此案提出，即經大會通過，交中央研究院研究後，再呈國民政府訓令出席國際聯盟會代表，提供國際改曆會議之研究。至於高先生熱心贊助而常常與人商榷者，尚有簡字方案、度量衡方案等，或見於雜誌，或僅存函稿，尙未發表。有一次他爲着推行新度量衡，使深入民間起見，提議將銅輔幣的直徑有所變更，使等於新制的若干公分，俾一般人把

銅幣權充新制尺度之用。又有幾次，他把改革電報便利發電人的意見，貢獻給交通部電政司長某君。結果竟被采行。高先生祇期便利於社會，對於自己的工作多未宣傳。但對於別人研究的結果，卻力任宣傳之責；其大公無私的精神，真足敬佩。

第八，高先生是一個義勇的膽怯者。高先生常說自己膽小的確，他的膽子並不大；而且思慮周密的人，世事看得太透，在這個遍地荆棘的世界，自然有格外慎重之必要。但高先生雖然膽小，遇着必要的時候，尤其是遇着朋友急難的時候，他簡直不怕身入虎穴。十年前我曾一度被難，身陷匪窟，那時候先父以病廢，不能行動，兒輩尙幼，家母內人束手無策，而平素以膽怯自居的高先生獨負全責，爲我營救。其冒險的情形，非片言所能盡。其義勇的精神，尤非膽怯者所能有。

總之，高先生對家庭、對朋友、對事業、對學術，從現代的意義評量起來，任一方面都算是理想的人物。胡適之先生稱他爲現代聖人之一，絕對不是過分。我小時失學，沒有良師督教；我的幾個哥哥，又早年見背；我的父親對我的管教向極放任。我就在這樣情形之下，自己造成一個世界；因此個性過強，落落寡合。自從獲交於現代聖人之一的高先生，有形無形都受了他的很大影響。假使近年

我能够在任何方面有些貢獻，高先生至少應居過半之功。高先生待我不僅是最知己的朋友，簡直要超過同懷的兄弟。所以我正可模倣君珊小姐的話而說：『別人家祇不過死了一個好朋友；我卻不但死了好朋友，而且死了最可愛的長兄。』

高先生的嘉言懿行還多得，有工夫我再詳細追記下來。——見東方雜誌

二十五年，九月，八日。